

前方

雜誌

伸張正義
打壓勢力
魚民血淚
何處伸
揪出漁業類

二二八專輯
大鼓與黑牢
事變中的王育德

向魚蟲進軍
戡亂體制下的民主
戰爭中的男與女
最後的農民

1987年 3 月號



牛繩

圖 / 徐仁修
文 / 林平

歲月像廢棄的土地一樣荒蕪
生活如對襟唐衫般早已過時
手中迂迴捲繞的牛繩啊
就像此生走過的曲折道路

前方

雜誌

1987年3月號

- | | | | |
|--------|---------------------------|-------|----|
| 〈社論〉 | 光輝與陰影
——「三化政策」和三民主義的矛盾 | / 本刊 | 1 |
| 〈特別企劃〉 | 二二八四十週年專輯 | | |
| (之一) | 大鼓與黑牢
——我的二二八經驗 | / 唐山 | 4 |
| (之二) | 美夢與悲劇
——懷念王育德兄兼憶二二八 | / 郭仲 | 8 |
| (之三) | 二二八的省思 | / 何平 | 12 |
| 〈時事分析〉 | 重估戡亂體制
——立法院長任期的另一個看法 | / 張大林 | 18 |
| 〈名詞淺釋〉 | 環境權 | / 許思元 | 22 |
| 〈現場報告〉 | 最後的農民
——美濃菸田採訪記 | / 張粟 | 24 |
| 〈封面故事〉 | 向漁蟲進軍
——東港漁民的抗議活動 | / 洪田浚 | 32 |

發行人 / 蔡裕榮

總編輯 / 林華洲

編輯 / 李興民 · 陳崇北

編輯部 / 台北市臥龍街195巷38號 5樓

電話 / (02)7328478

郵撥帳號 / 1025072林華洲帳戶

郵政信箱 / 台北郵政29-247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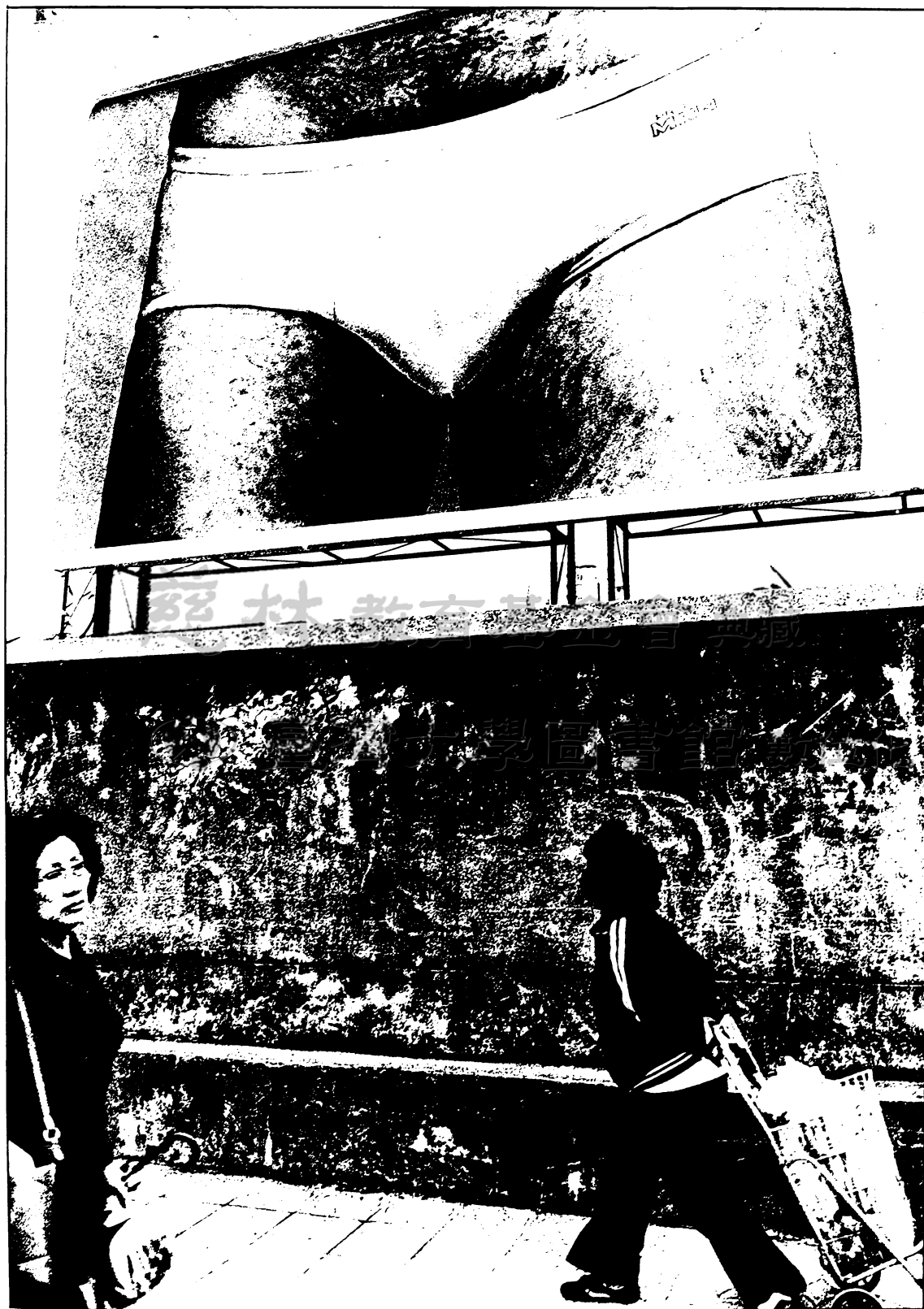
發行所 / 台北市景美區景隆街56號

零售價格 / 每冊66元

長期訂戶 / 全年660元 · 半年350元

出版登記 / 局版台誌第1604號

《觀念探索》	失業率與你	/ 方 達	42
《國際瞭望》	到團結之路	/ 辛一鳴譯	46
	——南韓勞工 · 民主運動的實態		
《前方短打》	戰爭中的男與女	/ 林 松	52
	——從「聯合艦隊」的廣告詞說起		
《藝文》	安息吧！親愛的同學	/ 魯堅秀	53
	——敬悼張金增學長		
《國際瞭望》	柯莉，妳在哪裡？	/ 費新南	54
	——曼迪歐納橋泣血民衆的呼喊		
《歷史與人物》	日據時代的台灣學潮(下)	/ 林 涯	58
《藝文》	短歌兩首	/ 金 山	63
	/ 我的媽媽		
	/ 現實		
	編後語		64



男性

1995年
7/27

巨大的超級男性
都市誇張的無聊風景
只爲了多賣幾碼布料
有只以一個潮流流行



慈林教育基金會 典藏

國立臺灣大學圖書館 數位化

採擷

圖 / 徐仁修
文 / 林 平

領著一隻小筏像牽著一匹小白馬
一步步涉入深水走向魚兒的老家
不是捕捉魚蝦貝介啊只是來採擷
我要翠綠的海菜不要白色的浪花

光輝與陰影

本刊

——「三化政策」和三民主義的矛盾

去年以來，因為內外條件的激烈變化，逼使國民黨政府做了一連串的政策調整以爲因應，概括而言有以下三點：

首先，是所謂「國際化」，即在國際——主要是和美國的貿易、金融活動上，撤除國家藩籬、廢除人爲操縱，任令資本主義的經濟規律充分發揮作用，因此，而有從美式速食店的不斷冒現，到美烟洋酒的列隊登陸，以至於對美匯率及通商條件的改變等等，使台灣一步步更加緊密、牢固地編進以美、日爲首的資本帝國主義體制。

其次，是所謂「自由化」，即在國內範圍的經濟活動上，廢除特權壟斷的經營方式，完全依照資本主義經濟規律公平競爭，以此而有國營事業開放民營之議。

最後，則爲「民主化」，即相應於經濟領域的改弦更張，在政治領域所作的變革。亦即承認新興的經濟勢力在老舊的政治結構中的存在。以此而有戒嚴的解除，以及黨禁、報禁的開放。

以上的「三化」，一言以蔽之，「資本主義化」而已。其中，「民主化」的要求，顯示了台灣在資本主義化的過程中，已經培育了一定數量的資產階級，他們要求在政治上享有和他們在經濟上同等比例的權利；至於「國際化」的提出，則預告了台灣對於美國日深一日的依附。

把「自由化」與「國際化」相提並論，似乎意味著兩個不同的經濟領域與活動方式，但在實際上，國際化之後的自由化——這「自由」也只是美日商品、資本「進出」台灣的自由

而已——體質孱弱的民族資產階級在跨國公司、國際財團的強大壓迫下，只有被抑制、削弱甚至淘汰之一途，其結果是使得台灣在世界經濟地圖上，更加殖民地化，更加成爲美日的附庸。

對於這樣的發展趨勢，孫中山先生在國民黨所賴以建黨、建國的《三民主義》中，早有先見之明地提出了針鋒相對的主張——以民族主義對治國際化，以民生主義對治自由化，而以民權主義對治民主化。其中值得一提的是民生主義與自由化的矛盾關係。

民生主義的要義之一爲「節制私人資本，發達國家資本」，以此而有國營事業的設置，用意在於不使私人控制關乎人民生計，甚至國家命脈的主要企業，並防杜社會貧富的極度不均，這與近年來歐洲發達資本主義國家之將大企業國有化的理念相符，基本上是極爲先進的設計。然而在實踐中却問題叢生，弊病百出，主要癥結在於封建官僚以國營事業爲私人牟利的工具，枉法貪贓者有之，結黨營私者有之，遂使國營事業成爲填之不滿的無底洞，成爲國庫的沉重負擔，完全喪失了「發達國家資本」的功能，解決之道，乃在於加強監督。如今，捨此而不由，所謂「開放民營」云云，只是民族主義瓦解，帝國主義入侵之後的一個必然結果而已。

「三民主義，吾黨所宗，以建民國，以進大同」，如今，三民主義似乎要被「三化政策」取代了。三民主義的光輝在照亮大陸之前，却先投下了一個巨大的陰影在台灣，偉大的孫中山先生地下有知，不知作何感想？

特別企劃 之一

大鼓與黑牢



——我的二二八經驗

/ 唐 山

我來台灣很早，民國卅五年就來了。

身兼編輯與教員

來台之後，在報社當編輯，同時也在某中學兼課。因報社的工作並不太繁重，加以年輕，所以兼了兩處的工作，倒也還能勝任愉快。

我教的是歷史，也許是因為個性比較隨便，又沒有為人師表應有的嚴肅外表，講課時也喜歡東拉西扯一些趣味性的雜談，所以學生們對我的印象好像還不錯。

記得是卅六年，二·二八事變爆發前的某一天。台北的冬天大多是陰暗的，而那天的天氣却特別晴朗溫暖。上午我走進教室正要開始上課時，有個學生舉手建議：

「老師，今天的太陽好暖和，我們到外面上課，一面曬太陽，一面聽老師講，好不好？」

法國大革命的故事

遇到這樣的情形，我一向

都難以拒絕，就帶著他們到球場上去，大家坐在洋灰台階上曬著太陽上課。屋外當然沒有黑板，也就無法寫講義大綱，於是學生們理所當然地要我講個故事。

因為我的另一個職業是新聞記者，學生們大概以為我的腦袋裡一定裝有一大堆奇聞逸事，便常常要求我給他們講故事。

那一天，也不知道怎麼心血來潮，一開講竟講到一七八九年法國大革命去了。從路易十四的宮廷生活到巴黎飢民攻打巴士底監獄，我講得很起勁，學生們也聽得很入神。一個鐘頭就這樣很快地過去了。沒想到這次毫不經意的法國大革命故事，竟然在幾天之後給我帶來了一場凶險。

台北發生騷動

大概是廿八日的上午，我很晚才起床，準備要到報社去上班，吃早餐的時候，才從報紙上知道台北市昨天晚上發生了騷動。我這個記者也實在太不像話，住在市區內，竟然還不知道出了這樣的大事情，正

忙著打算把新聞看完，宿舍的工友進來告訴我，有一大群人圍在專賣局前面，大聲喧嘩叫喊，情勢非常緊張。

我一面看報紙，一面隨口說了一句：「難道是一七八九年巴黎市民攻打巴士底監獄的台灣版嗎？」無意間說出這句話來，大概是潛意識裡還殘留著幾天前給學生講法國革命故事的記憶吧！

看完了報，我的好奇心也已昇到了頂點，反正要去上班，身為記者，不如先到專賣局走一趟，看看現場，然後回報社寫一篇現場報導。

這樣想著，離開了宿舍之後，便走向本町的專賣局。還沒有到那裡，半路上就聽到了隆隆的大鼓聲，走近一看，的確是一大堆群眾，少說也有好幾千人，我的視線立刻被那擂鼓的大漢所吸引住了。

雄壯的大鼓陣

一輛拖車，上面放著一個幾尺直徑的巨型大鼓，車上站著一個大漢，在二月的冷天裡，光著上身，頭上繫著布條，兩手握著鼓槌，正在那裡使出

混身氣力播著那面大鼓。

他那樣子，立刻使我連想到水滸傳裡面的黑旋風李逵，江州法場大劫囚的場面。

這樣的大鼓車還不止一輛，竟然排成一長列，大約有二十輛左右，二十個大漢同時播鼓，這就是我老遠便聽到的鼓聲了。隆隆震耳的大鼓聲此起彼落，聲勢的確雄壯，蟬集的群眾都因此顯得非常興奮，彼此高聲談論著，不時有人高聲咒罵。

這時，專賣局的大門緊閉，裡面的人想必都已跑光了。當鼓聲告一段落時，有一個中年人跳上鼓車，開始演講，群眾看到有人講話，就圍攏過去。我也隨著人潮推擠著靠近去。

一場激烈的演講

那個人用閩南語演講，我雖然是江西人，但因為曾在廈門住過半年，所以雖然不會說，但却多少可以聽懂幾分。演講的人音調高昂，並不時做出有力的手勢，好像是說專賣制度是日本人的殖民地制度，國民政府為什麼還保留它，是不是把台灣也當殖民地看待……。還罵接收的官員亂來，都想發財，都沒有為台灣人的幸福著想。又說我們來圍這個專賣局，不只是因為專賣局的人打死了台灣老百姓，最要緊的是，專賣局是剝削台灣人的機關，是國民政府的暴政的象徵，所以我們才到這裡來抗議等等。

他的一席話，我大概聽懂

六、七分，雖然有些要靠猜測，不過，大概就是上面那個意思。

接下去的幾句話，特別引起了我的注意，他說：

我們都是同胞呀

「我們台灣人不會像他們那樣亂來，今天我們也不會亂打外省人，因為是政府不對，打外省人也沒有用，大家都是同胞呀！我們只要政府改善不公平、不合理的制度……」。

不知道是不是我過份的敏感，當他講到這幾句話時，好像特別掃了我幾眼。

這時，人群中有人喊：「播鼓呀！」鼓聲便又響起來了。有人在振耳欲聾的鼓聲中高喊口號，而我也就擠出了人群，趕快到報社去了。

那是頭一次群眾包圍專賣局，這次的包圍，至少在我在場的一個多小時裡，並沒有發生破壞或攻擊行動。據說到了下午，群眾第二次湧到時，情勢就混亂多了，建築物、車輛、器物等，大多遭到破壞或縱火焚燒，也有人受到群眾攻擊而受傷。

要命的中山裝

話說我擠出人群，離開專賣局現場到了報社，一進門，裡面的人看到我都怔住了，有一個同事尖著聲音叫道：

「你怎麼搞的，這時候還穿中山裝，你不要命了！」

我這才會過意來，也才發

覺自己身上果然是平日穿慣了的那一套中山裝。

「穿中山裝怎樣？」我雖然懂得了他們的意思，還是反問了一句。

「市內有幾個地方已經在揍外省人了，你這一身打扮恐怕會挨揍，趕快換下來！」

「可是我剛從專賣局那邊的人群裡擠出來的呀！也並沒有人盤問我，更沒有人揍我呀！」

嘴上雖然這樣說著，我也開始緊張了，想到這裡是報社，很可能變成群眾攻擊的目標，於是我趕緊脫下中山裝，隨便在工作室借了一件上衣穿上。

同事的好心掩護

當時的報紙還是中日文兼有，辦公室有兩排桌子，一排坐著編中文版的編輯，對面另一排是編日文版的編輯。有一位日文編輯同事說：

「等一下如果有群眾進來，你們那邊都不要開口講話，由我們這邊的來應付」。他是怕我們這些外省同事被認出來，遭到攻擊。

當時在那樣的緊張情況下，本省籍同事還能替我們的安全著想，實在是難能可貴。好在那一整個下午，報社都沒有遭到攻擊，只記得有附近的一些民團來商借報社的車輛，我們當然是除了答應之外沒有第二句話了。

那幾天，我當然不敢再到街上溜達，更不用說穿中山裝

了。不是回宿舍，便是呆在報社裡。第二天起，報社也暫停出刊了。

陌生的訪客

在這一段時間裡，發生了示威群眾往長官公署請願抗議，遭到衛兵開槍掃射，造成不少傷亡，也發生了群眾衝進警察局，奪槍、毆打警察等等。不久，警備總司令部就發佈了戒嚴令，市區到處都有軍憲佈崗，却也有一些武裝的民團和學生們時而出現在街頭上，整個情勢變得十分混亂。

學生佔領了廣播電台，廣播所謂的「二·二八處理委員會」的宣言和組織活動。當時我們報社得到的消息，台北市有一部分在陳儀的控制下，另一部分則在民衆的控制下。情況一直混亂下去。

有一天，我正坐在報社的編輯桌前，工友拿了一張名片進來找我，說外面有一個人要見我，我看那上面印了某報社的名銜，但我對那報社和那個人都不認識，心想，在這個混亂的情況中，陌生人還是不見的好，就告訴那位工友，我不想見這個人。

恐怖的西本願寺

工友出去傳達了我的意思，結果那個人怒氣沖沖地衝進來，說他是警備總部派來的，一定要我跟他去走一趟，我沒辦法，只有隨他出來，一到門口，他便掏出手槍抵住我的腰

，然後用一塊黑布把我的眼睛蒙起來，粗暴地把我推上外面停著的一輛吉普車。

車子在市區繞行了很久，終於停車了，他們把我推下車去，解下蒙眼的黑布，原來是西本願寺，我知道我來到一個恐怖的地方了，可是不知道自己為什麼原因被捕。

我的手上還綁縛著繩子，看守命令我伏在地板上，不能亂動，不能隨便講話，大小便要喊報告。就這樣，我在那恐怖的黑牢裡被關了一個多月，也沒有人來問我，也沒有人告訴我為何被抓。後來還是片片斷斷地由同牢的難友們聽到了一些消息，比如建中校長陳文彬也出了事，報社也有同事被捕，或者失蹤。也聽說中央派了鎮撫部隊來了，外面正在大事逮捕、槍斃人。

歷劫歸來

過了幾天，有些牢友被放出去了，也有的聽說被活埋掉了，一時人心惶惶，都在恐怖中過著心驚胆戰的日子。

到了三月底或四月初，我終於被釋放了。被抓來時固然莫名其妙，被放走時，也是丈二金剛摸不著頭腦，不知到底是怎麼回事。不過，能平安回家，當然是值得慶幸的事情。

在回家的路上看到很多的憲兵警察，荷槍實彈佈崗巡邏，槍上的刺刀耀眼生輝，疏疏落落的行人驚慌地走在街上，很多商店還關著門，全市一片肅殺景象。我雖然剛渡過一切，心情却怎麼也高興不起來。

回到宿舍後，才知道報社、學校都已人事全非。被捕的、逃亡的、被殺的、失蹤的之外，劫後餘生的少數人都也弄不清楚彼此的近況了。流言雖然很多，其中的真假却無人能斷定。

如謎的往事

至於自己為什麼會被捕？我在事後一直苦思著。後來我想到了兩種可能。

第一，也許是因為我在大陸時的資料，所以把我當成危險分子，為了預防我的「不逞」行爲，做了個預防管制。

第二種可能，也許因為事件發生前不久，我在學校給學生們講過巴黎民衆攻打巴斯底監獄的故事？

如果是後者，那未免太荒謬，也太可笑了。但想到那個時代的整個政情的「荒謬性」，誰又敢斷定絕對無此可能呢？

最後，我想到那一天我身穿中山裝，擠在包圍專賣局的群眾裡面，竟然沒有遭到攻擊，應該感謝大鼓車上的那位演講者。因為他在那群情激昂，即將達於沸騰的時刻，講了一些非常理性的話，顯然就是他的那些冷卻性的言詞對我產生了保護作用。我當時一再感覺到他的眼光不時掃向我，如今想來，豈不暗示著我應趕快離開嗎？他在人潮中發現了穿著中山裝的我，有意化解我的危險，站在做爲同胞的立場上，他向一個外省人表示了當時台灣人的心聲與無奈。

美夢與悲劇

——懷念王育德兄

一九八四年底我回台灣時，有位朋友說要給我接風，邀我到一家日本料理店去吃飯。

三十幾年不見的老朋友，重逢時彼此都已兩鬢飛霜，不覺相視默然，竟忘了寒暄。落座後才各問別後遭逢，人事滄桑，以及一些共同朋友的近況。話到半途，他突然想起，說數月前去過一趟日本，見了王育德兄。

英雄老去

聽到這個名字，我一時覺得好感慨，我和育德兄已經近四十年沒見面了。他那白皙長身，一派斯文的形像，立刻浮現在眼前。

我們最後一次晤面是卅六年二·二八事變過後的暑假中某一天，自從那次分別後，便不再有過面晤機會，也沒有通過音訊。只風聞他後來在日本參加台獨運動，成為理論指導者之一，也出過幾本這方面的書，我却都無緣拜讀。

我以懷念和好奇彥彥的心情問這位朋友，育德兄近況如何，身體還好吧。朋友表情有點愴然，說：

「因為育德兄的政治問題，我也幾十年來一直沒有見過他。近年常覺得人的確老了，時常想起早年那段歲月中的一些朋友。最近一次

的日本行，看了幾位在日本的當年學友，一時間想起了育德。借酒壯膽，向他們要了他的電話號碼，回旅館後掛了個電話，結果，你猜怎樣，育德的聲音蒼老了，問明了我的名字後，竟然在話筒的那一端哭起來了。我一時慌亂，問他哭什麼，他說，故鄉老友們，幾十年來都過境不敢相互聞問。今天算是第一次聽到了一位熟人的聲音。」

育德把自家的處所告訴他，並告訴他怎麼走。

「我立刻動身，帶一瓶台灣竹葉青，驅車前去。找到了那所房子，我們長談了一個通霄。他的房子很小，半夜裏叫了兩碗麵，算是招待。以一個大學教授，這樣的生活格局叫人不可理解。不過後來想到，他一定是為了他那主張，投入他所有的一切，而顧不及自己的生活享受。這一點他沒有變。雖然在其他方面，他的見解我不太能理解，但他的真摯和熱情，還是叫我肅然起敬，一如四十年前」。

兩人說著、聽著，記憶中的往事逐漸勾串起來了，不禁為之唏噓。

帝大學生

我認識育德兄，是由他的胞弟育彬兄那裏來的。

育彬兄是我的學長，雖然不同年級，却因為同好音樂，有時候我到他家——當時在台南市本町，浩然堂書店附近——去聽唱片。

/ 郭 仲

兼憶二二八

王家是台南的老商家，好像在做物產生意。育彬兄有幾個兄弟，我本不認識，他家書房裏、書架上好多書，且大都是文學、哲學方面及其他人文科學的書籍，我知道育彬兄對這方面並沒有大興趣，問他是那位兄長看的。他說上面那個哥哥，名叫育德，正在東京帝大念哲學。這位帝大生當然在東京，只在暑假回台。

我認識育彬兄的時候，時局已進入到太平洋戰爭中期。我們的暑假不是被調去搞「奉仕作業」（勞動服務），便是特殊軍事訓練（如，馬事訓練、船舶兵訓練等），即使育德兄歸省，我們也少有碰面的機會了。只有一次，和育彬兄聊天，有位帶眼鏡的青年進來，朝我點了一下頭，從書架上抽出一本書就走出去，原來那就是育德兄，我們的初次見面，竟然是這樣不交一語的一面之緣。

後來戰事日緊，育彬兄先畢業，我們在校生忙著各種訓練，有一段時間沒有相聚機會。到了日本投降，情況相當紊亂，人們的心情却因脫離了日本的桎梏而興奮著，但生活却沒有改善。幾個朋友有的繼續求學，也有的為了生活而奔波著。

同台教書

有一天我到台南，聽到朋友說，育德兄因日本投降，學校暫時停課而回到台灣來，在台南一中謀到了一個教席。

課餘之暇他和幾個朋友和學生，組織了一

個小劇團，借用「宮古座」（日人經營的劇院）數天，上演了幾齣戲，主題都是諷刺日本人，成績還不錯云云。又說劇本都是有文藝素養的朋友們自己編寫，由育德兄導演。我聽了之後極為興奮，心想育德兄以帝大高材生來導演這幾齣戲，必定不同凡響。

朋友更說，育德兄還親自粉墨登場，扮一位風趣老頭，「他那一口閩南語，流利極了。比那職業導演還棒呢。」我在佩服之餘不免略為驚奇。因為那個世代的台灣青年，除了簡單會話外，很少有人能把一段話用純正的台語從頭講到尾的，總不免要夾雜幾句日語進去。別說一半一半了，七分日語三分台語，大概就是般水準了。育德兄的閩南語，究竟從那裏學來那麼完整，叫我們好納悶。

後來聽說他再渡日本後還寫過台灣語典之類的書，可見他是有語言方面的天才的了。

談談孔子

幾天之後，我在報紙中的藝文欄裏看到一篇文章（當時的報紙還是日文報），批判孔子學說的封建性，作者的名字竟然就是王育德。

我以好奇和些許期待的心理仔細讀了一遍，却覺得有點格格不入。當時的我當然談不上什麼思想見解，其實對孔子也除了懷有一份屬於漢民族的驕傲心理（因為日本人也尊重孔子）外，沒什麼特別深入的理解。却偏巧手邊有一本書叫《孔子鑑賞》，是一位日本漢學家

所著。內容正如書名，不是學理的闡揚，而是一種趣味性的人格禮讚，寫得相當動人。我糊里糊塗地也寫了一篇反對文章，取了什麼題目早已忘了，只記得大意是說我們要對孔子的人間性給予最高評價而不應只偏重他的政治性。寫好之後，我託人帶給育德兄。當然我也有自知之明，要跟一位帝大哲學系學生議論孔子（他是專攻東洋哲學的），怎能講得過他。只好學那位日本漢學家，盡量寫得感性一點，還不忘抄上書中的幾段上去。過幾天收到育德兄的一張明信片，約我到他家喝茶，「談談孔子」。

那次見面，算是我和他之間的第一次正式交談。他以先賢的從容態度問我幾個問題，而我則靦腆地說些自己也覺得似通非通的話。他大概也聽出我所知不多，也就不以為甚，我自然也不敢「論」得太多。

很快地，我們拋開了孔老夫子，無拘無束地開始天南地北地聊了起來，自然是我問得多，諸如有關東京帝大的學閥問題等等，他也附帶說了一些中國北京大學的自由學風。在我的印象中，當時的育德兄對中國是嚮往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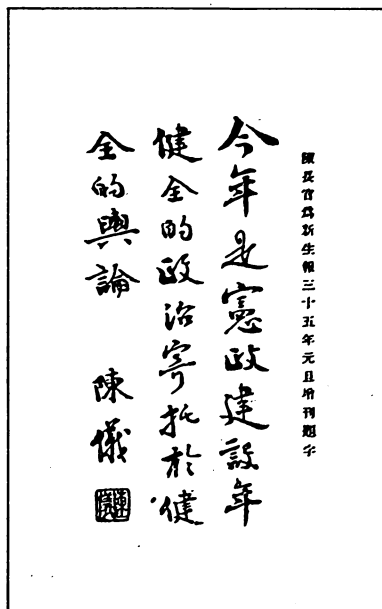
最後，他看我就要起身告辭時，給了我一句算是勸告的話，他說我們這一代台灣青年的中國文明觀，大多得自日本的漢學家，而現代中國的新面貌，不是那些日本學者所能理解的，因此他勸我趕快學好白話文。

身經事變

這次分手後，很長一段時間我們都沒有再碰面。我只知道他在台南一中教國語，很受學生愛戴。一直到卅六年，二·二八事變爆發，我才在一次偶然機會又遇見了他。

二月底爆發在台北街頭的官民衝突，很快地蔓延到南部。台南市也很快出現了主要由失業青年組成的自衛隊。此外，還有學生隊。他們接收了警察局槍械庫裏面的武器自行武裝。並且也成立了「二·二八事件善後處理委員會」。

我當時不在台南，不知道育德兄本人有沒有參與自衛隊或其他組織，大概沒有。可能留在學校照顧學生。不過也風聞他曾經帶領了一



批不是學生的年輕朋友，到台南車站對面的中華日報社，要求社方交出報社由群眾監理。因當時報社的外省主管都已隱匿，社裏只留一部分本省籍職員，經過一陣討論後不得要領，也就沒有結果。

中央增派的二十一師登陸前數天，台南出現了一次由「二·二八善後處理委員會」策動的群眾大遊行。就在那一天下午，我因家人有病，到台南的藥店去抓藥。黃昏時候想趕回家，不期然在車站附近的街道上遇見了育德兄。

當時他大概要到台南一中，走得很匆忙，經我一叫，停下來看我，即拉我走進附近的騎樓下，就在那裏談了起來。

他簡單地把數天來的本市情況告訴了我，說學生們很興奮，也很徬徨。我說這是你發揮指導力的時機。我還問他關於他企圖接收報社的那一件事，他只淡淡地說時機已經過去了。然後列舉某些本市處理委員會委員的名字，說除了兩個人外（他指的是主任委員湯德章、委員莊孟侯）其他都「毅力誠實兩不足」，並說「我們台灣人就是缺乏人材」。

台灣自治

因為前一天我看到中部下來的一輛軍用大卡車，載滿了武裝群眾，散發著要求自治的傳單，所以就問他有關台灣自治的問題。他提了

二二八事件

肇禍兇犯真像



【本報訊】昨(三)日本報報導，二二八事件之兇犯真像，經警方偵查，共獲兇犯(十七人)，其中(十一)人，經警方偵查，共獲兇犯(十七人)，其中(十一)人，經警方偵查，共獲兇犯(十七人)...

處委會治安組昨開 臺北市臨時治安會 決定章程通過辦法五項

忠義服務隊組織已確定

【本報訊】二二八事件處理委員會治安組，昨(三)日下午四時，在該會第一會議室，召開臨時治安會議，由該組主任委員(即處委會主任委員)主持，到會委員有：...

假我還見過他一次，覺得他很消沉，講話都不起勁。後來又聽說他在學校被一名太保學生毆打過，那個學生是本市名紳的兒子，弄得他既傷心又寒心，感嘆著說「台灣太亂、太無聊，人心太墮落，事無可爲了」。然後就聽到他再度赴日的消息。

一九八六年某日，我在報上看到他的死訊，一時感慨萬千。他在日本出的書，我都沒有看過，但他的主張是聽說過的。我雖不苟同他的見解，但還是認爲他是那種「心地善良，不切實際」的有心人。二·二八事變高潮中那一夜的街角對話，並沒有滿足我的期待，却只表現出他的無奈和徬徨。不過他說的那句「尼采式的病態心理」，也許是較有深意的警句。

總之，育德兄是這個時代的台灣知識分子的悲劇典型之一。他是學哲學的，而哲學，應是窮事理於奧微，聯規律於萬象間的，很艱辛的理性作業。加以，要突破幾個世代的被壓迫人民用血淚凝成的歷史情結，是頗不容易的。偏偏，育德兄是位熱情有餘，冷徹不足的人物。他終身被拒於他自稱「事無可爲」的故土之外，却爲了它孜孜矻矻地編織一幅美麗的夢景，嘔心瀝血，至死方休。也因爲他這一點「知其不可爲而爲之」的執著，我對他的懷念總是悲愴的。

一九八七年二月 於台北

一個組織的名稱(我已忘記)，然後想了一會說「自治恐怕是此刻所能提的最高要求了。其實，台灣人連自治的條件都沒有的。」

我覺得他的話有點悲觀，想再和他論下去。他却口裏喃喃自語，好像是「尼采」的話如何如何，使我一頭霧水。我有點著急說：「尼采跟二·二八有什麼關係？」他這才正容回答我說：「尼采看到了全副武裝的軍隊就會莫名地興奮起來，這是一種病態。我怕我們這裏也會有這種人」。我聽懂了他的話却仍然不懂他的意思，覺得他有點不切實際。

其他我們談了些什麼已記不起來，却記得有幾個武裝的自衛隊員，可能要到車站去換班，從我們身邊走過，還回頭問我們在幹什麼。於是我們在夜寒中分手，心情極度沉悶。

幾天後國府增援部隊進駐台南。果然育德兄讚揚過的兩位處理委員立遭逮捕。湯德章當日不經審判便被槍斃，莊孟侯先被判死刑，後改無期(後來被假釋，不久去世)。

客死異鄉

在那段緊張恐怖的戒嚴時期，我未曾和育德兄連繫過。但風聞他的長兄，一位法官，也在混亂中被秘密處死。我們都知道他這位長兄並沒有參與過任何活動，只是平日和法院的外省籍同僚有隙，被趁機公報私仇。那一年的暑

二二八的省思

/ 何 平

慈林教育基金會 典藏



臺灣大學圖書館

定性，除了執政當局出於「反共國策」的刻意宣揚，如謂該事變起因於潛伏共黨分子的煽構，及不當的地方偏見，如謂台灣人長期接受日本教育，懷有蔑視祖國的心理等等之外，在部分台胞中亦有將其擴大變質為「異民族侵略」的極端論者。

不論執政者的政策性掩飾，抑或反體制運動者的策略性扭曲，顯然因其不合乎實際而難使一般持平論者信服。我們如果從至今所出現的二·二八事變論文中，把上述的兩種不實成分過濾掉，則所剩下來較能反映現實者，不外：陳儀等接收官員及駐軍的濫權貪財、亂紀擾民，和台民由歡迎到失望，由失望到憤怒的受害者心理，上下相激而造出了「官逼民反」的典型事件，逼出了「二·二八」的流血慘劇。

如此的提法雖也屬實，然究竟偏於現象層面的陳述，對於當時台灣社會與大陸社會之間，基於彼此的內部結構，在一定的歷史條件下甫行建立的初期調適階段的本質和脆弱性尚未觸及。因其常識性的「官逼民反」論，具有不周全和說明力不足的缺陷，故將容許各種不當

一九四七年，民國卅六年二月杪，春寒籠罩的台北街頭上，爆發出官民武力衝突的劇變。不數日之間，變亂蔓延全島，北、中、南部幾處主要城市，都相繼出現了民衆武力接收行政機關，攻打軍事據點的戰鬥局面。一時驚動了南京國民政府，也轟動了全球傳播系統。

此一事變自發生到落幕，僅及數週，然因台灣甫自日本五十年統治下的殖民地地位脫離，復歸其一八九四年被割讓以前的中國領土地位，而當時對岸的中國大陸上，政治局勢亦正趨向複雜化，致使大陸一台灣兩地的雙邊關係因此蒙上了某種微妙特殊的陰影，甚至隨著其後數年間中國政局的全面丕變，此一事件竟然變成了長達四十年的民族夢魘。影響所及，不論大陸人或台灣人，都受到了莫大的心理創傷。

然而時至今日，有關二·二八事變的歷史

的論理飛躍，如大陸人亦懼亦恨台灣人的「排外性」，而台灣人亦有大呼「中國民族性中的殘酷性」者。部分執政者和另一方面的部分反對運動人士，不幸若以此種非理性心態相向，無異於在災禍遺蹟上再放置未來新禍患的火種。四十年來國事世事都已經歷了相同的遞變，尤其是所謂的「中國結」「台灣結」，互相糾葛，彼此激盪，已到了令人覺得非有一個徹底的澄清不可的地步，而澄清二·二八論議的目的，當然在於「以古鑑今」，從歷史的創痛中，尋找出一片屬於歷史科學、社會科學的脈絡，好讓現時點上的一些心理糾葛得以解開，得以用較為澄明的眼光，清醒的頭腦，重新思考一些目前及未來即將面對的問題，特別是當代歷史潮流中的一個大懸案——民族的再整合問題。

筆者自知個人才疏學淺，只是感於時光白白流逝未免可惜，對某些敏感問題不敢碰觸，而任其在歷史的大槽中發酵，到頭來別又是一場悽風苦雨。是以不憚淺陋，草就此一短文，不敢企圖提出答案，只提一個角度，好讓同胞中見識高、受有專業訓練的年輕人，就幾個問題各自思考一番。

這裏我們不妨把「官如何逼，民如何反」的歷史真實的探究工作交給歷史學家們去做，而暫從「官為何逼，民為何反」的社會體質方面去追究。

一個社會的反常現象，必然是一定的外在條件對該社會所起的變異作用，要理解此一反常現象之所以發生於此而不發生於彼，一定要從它的內部情況求其基因。不論在人體或在一個社會，「異變」都要從生理和病理的辯證關係中去把握。而對特定社會的體質探究，則難免涉及歷史觀、社會觀的運用，因此難免有人以「意識型態症」相譏責。但筆者愚意並不在「鞏固」什麼意識型態，而只是「借用」一種意識型態。愚意以為，不是「意識型態症」，

而是「意識型態恐懼症」才是造成今天如此嚴重的認識黑洞的原因，而為了讓過去真正成為過去，不再繼續醞釀成未來的禍源，我們只有消滅那些黑洞。

二·帝國主義世紀中的中國病變

中國痛遭百餘年的帝國主義欺凌，我們身心感受中的國家，是破碎而從未完整過的。（筆者此語乃置身事變當年的感受）。但這種破碎國家的政權，只有面對外來的強大帝國主義勢力時才是弱者，對自己的人民，却永遠是橫暴的、強悍的、無上權威的統治力量。當然這一特質並不是近世中國所獨有的，而是所有處在近代資本帝國主義恒常壓力下的國家所共有的。它的政權的確是脆弱性和強暴性的混合體。這與民族性無關，而是一種更現實、更急切的外來壓力所促成的病變而已。

在尚未遭遇外來強權的欺凌之前，封建王朝對人民的橫暴與剝削也是相當酷烈的。但除非在戰亂期間，這些政權的強暴性質總是被定型化在制度運作下，對人民生活的實際衝擊多已被慣性化了。這樣人民的應付方式就被允許一定程度的從容性，使人們在日常生活中的受害感覺的急迫性減低一些。

一個政治控制的緩急繫繫最大的一個決定因素乃是經濟領域的實際情況。因為經濟涉及的層面，是社會生存所需的物質資料的生產和分配。經濟情況的豐匱，遂直接決定政治控制的緩急。

當一個老大封建帝國受到近代資本帝國主義的侵略控制後，因為支配國的資本主義生產關係直接吸收或間接影響被支配地區的生產力要素，而在當地發生一定程度的資本主義同質化過程。亦即，被支配地區的原有的資本分配

圖發生變化，當地原有的部分積累資本，因為和支配國的資本活動發生關係而使其原有形式也跟著變化，或遲或早，在被支配地區也會出現一種與支配地區同屬一型的新生產關係。此一當地新型資本主義生產關係，乃支配國資本活動在該地區能暢行無阻的必要條件，因而而為支配國所支持，並且也受到在支配國影響下的本土政府所支持。

但這種來自支配國的支持有它的限度，因為它只希望在當地有一補助性生產活動，却不願其真正茁壯為一擁有競爭能力的對手。另一方面，這種落後地區新興的生產關係，往往都是經過如上述的外來因素所催生，而並非本土生產力自然發達後的成果。故而其強固性和機能，亦即，對生產力要素的組合作用，並不如先進資本主義的生產關係那樣的強韌有力。此所以有人將此一類型的落後地區資本主義生產關係，認為是一種跛行生產關係。

至於此一生產關係的跛行弱質，乃一因支配國的優勢阻力，一因本土舊生產關係的抵抗

。新生產關係既非純本土生產力發展的自然成果，則對舊生產關係的淘汰作用不強，即使將舊生產關係中的生產力要素吸收過去，也往往容其順帶一些舊因素。在這種基本情況下，代表不完整的，跛行新生產關係的，當地新興資產階級，和代表它的政治集團，一旦獲取政權，其階級基礎也必不穩固，其經濟建設、政治改革等種種措施，也必屢遭內外壓力。為了維持國內生產秩序，它必須以政治強制力來替代正常的經濟結合。當地資本主義生產關係的經濟契約性因而稀薄化，行政強迫性也就相對增強。

再因資本帝國主義生產關係對該地區的同質化過程，也就是外資剝削過程和掠奪過程。經濟制度的同質化並不意味經濟利益的均霑。換句話說，落後地區的資產階級，是通過被剝

削痛苦課程中去吃力地學習資本主義。但他還有舊生產關係中的些許封建因素可加利用，拿來彌補後進資本主義的不完整性。這些都是落後地區以「現代化」為目標，代表新生產關係，也代表本土資產階級的政團，註定過早反動化、法西斯化的原因。

於是，政府、官僚、軍隊、警察等一切國家機器部門，都將因此一反動體質而在行為模式上、工作作風上帶有暴壓性，成了落後地區政治的一大特質。中國自辛亥革命以來的國內政治，不論掌權者為北洋軍閥，或為後起的中國國民黨，雖然兩者之間在政治觀念和實踐上有所歧異，亦有相對的進步落後之分，但其政治推展的暴壓性則一。

本土生產力處在帝國主義恆常壓迫之下，落後地區永遠無法實行充分的資本積累，而在弱質的生產力基礎上，分配永遠處在緊張狀態中。則掌權者自然傾向於利用政治手段，甚至制度外的直接暴力，來保證其「權力即金錢」的特權地位。

在人民這一方面，也因為缺少制度化的政經運作，經常處在政府的直接的政治暴力和經濟暴力的威脅下，為保生存，也必須利用制度外的直接自衛為唯一手段。對應於政府的暴壓性，往往激發出人民的抗暴性。暴壓與反抗於是相激相盪，如此惡性循環的時間一久，難免逐漸形成一個民族的後天特質。因此，假使有人以近世中國的政治為「蠻人政治」，請他勿忘此乃資本帝國主義侵略的惡果。

如果不是帝國主義長達一世紀的無情剝削，使中國陷入於長期貧困化，使中國各時期的官民關係在貧困狀態中更行惡化，助長了有權者的貪婪，官僚軍警的橫暴習性，則如二·二八那樣的悲劇當不至上演。

如果不是日帝長期侵略中國，割去了台灣，幾乎打爛了中國大陸，使兩岸隔絕達半個世紀之久，時空的隔絕產生了心理上的疏離，戰



爭的後遺症使一個窮乏國家陷入長期的內戰殺伐，二·二八那種骨肉相殘的悲劇也就不會成了歷史的必然。

三·帝國主義統治下的台灣情結

台灣自一八九四年被割讓後，直到一九四五年日本投降，復歸中國，經歷了整整五十年的殖民地境遇。

在這一段歲月中，台灣人民在異族統治下始終以中國為其精神祖國，五十年間除了後十年因日本軍國主義高漲，殖民地統治益趨高壓使各種社會反抗運動悉被扼制外，前四十年之間，各種有形抵抗不曾間斷，因此招來日本統治者的所謂「台民難治」的評語。

台灣在被割讓之前，是滿清帝國的一個新設省，島上的拓墾事業和一些特產經營仍未達當時技術範圍內的飽和點，生產力仍在上升中。一旦被收進日本版圖，在經過一段拒絕反應的武力鬥爭後，終於逐漸被轉變成日本資本主義總體系的一個新因素。

基於資本主義法制強迫移植的快速，隨之而來的是社會階級構造的急速變化，產生出如中國大陸上的弱質的工商資產階級，和經由統治者重新認可的中小地主，成為本地階級社會中的主要有權者。但是，這些中小地主的權利只是局部的經濟權而未及於政治權。也就是說，台灣社會的有權者在殖民地制度下，未曾擁有自己的政權，甚至代表其政治欲求的政團組織也完全缺如。

這種在政治領域中不擁有爭權工具的缺憾，成為台灣資產階級的致命弱點。

台灣本土的主要資本活動，非透過日本殖民本國的本地機關則無法實現，也就是說，台灣資產階級即使在法律上擁有如日本本國的資產階級一樣的所有權，也必須處於日本本國資產階級的附庸地位，因為他的所有權是不完整的。徒有所有權，而在經營上必須忍受殖民地單行法令的干擾約束，使其實際的獲利能力遠低於殖民本國的同業對手。

但這種殖民地有產者的負荷，仍可以轉嫁一部分給在生產關係中的下級單位，亦即佃農和勞工。此所以自一九二〇年代起，漸有工農

運動的興起，而這也是為什麼工農運動總是以殖民地雙重受害者的身分，提出「民族」與「階級」的雙重解放目標的緣故。

日本人對台灣社會運動的對策，採取的是分化手段，對於本地資產階級，是既籠絡又壓制，始終是聯合一部分打擊另一部分。但對工農大眾的反抗，則採取徹底的、全面的、毫不留情的鎮壓，例如轉向後的新文協、農民組合等左翼運動，在九一八事變後的日本軍部干政趨勢中被扼殺了。在政治層面上，資產階級的有限度的爭權運動，即使是最低姿勢的地方自治運動，最後也被迫解散。

接著而來的是日本帝國南進政策的大力推行，台灣成為日本太平洋戰爭的前進基地。在日本統治者的大力策動下，島內的皇民化運動和擁護「聖戰」運動如火如荼地展開，而台灣人民——包括資產階級、地主階級、小資產階級和工農群眾，極大多數都在嚴厲的戰時生活中，私下期待著戰爭之早日結束，好讓他們也結束物質缺乏、行動受制、精神苦悶的日子。雖然多數民衆不一定都具有國際法知識，但憑常識也不難預想到一旦日本戰敗，曾經擅自中國的台灣非歸還中國不可。

一般大眾對中國的實際了解即使不足，但那份民族血緣的扭帶意識可以說是超理論的存在，大家總把眼前苦難歲月的結束和復歸祖國的盼望，在主觀中緊密地聯結在一起。

到了一九四五年八月十五日，日本天皇果然宣佈無條件投降，台灣人民在那一瞬間所感受到的興奮和解放感，是無以名狀的。但這種復歸祖國的喜悅，却很快地被嚴酷的現實沖失了。國民黨政府派來台灣的接收人員的貪婪剝奪和駐軍的違法亂紀，先已自行破壞了自己的形象，而帶給人民最大衝擊的，還不是對黨軍政人員的惡劣形象，而是戰爭結束後，戰時生活中的匱乏現象不僅未見改善，反而物價更行高漲，物質供應更見缺匱，民衆的生活更苦。

戰爭結束，回歸祖國，在大眾的主觀願望中，應不只是法理上的殖民地身分的解除，同時也應該是政治權利的獲得和經濟生活的改善，然而現實的情況却完全打破了人們多年來在困苦中所寄託的希望。國民政府的接收態勢，很露骨地表現出征服者的姿態。

當年台灣所有主要工礦林業，絕大部分掌握在日人手裏，光復後却成為以浙江財閥為中心的行政院資源委員會的攫奪目標。而所有主要服務機構的文化財等，也都成為黨部的囊中物了。

於是國民黨黨政軍系統變成了日帝在台的掠奪和榨取的巨大積累的繼承人，而在日據時代受其無盡剝削的台灣人民，尤其是尚擁有資本能力的工商資產階級，痛失了期待多年的索還權利，繼承日人事業的機會。土著資產階級在大陸財團的壓力下其資本活動的空間較之日帝時代並沒有任何程度的擴大，而城市工人的工作機會也跟著失去了回昇的機會。

和日據時代比較而言，台灣工人的競爭者已非從前高工資的日本工人，而是更低工資的大陸工人。於是光復甫過一年，台灣資產階級的資金閒置，一般的生活水平降低，勞工階級失業率則繼續升高，他們都視中國為繼日本而來的新剝削者。鬱積日久的憤懣心理，只等一個導火綫，一般大眾在生存綫上的掙扎、知識分子由「自己人」形象的破滅到被出賣被愚弄的無奈感受，在在都是激起這次事變的要因。

不過，唯有農村，在事變爆發及蔓延的過程中，不曾出現過響應行動。或因農村當時正忙於回復生產，而農業生產要從戰時中的荒廢回復，除人力外無需大量投資。且在物價漲勢激烈的市場上，農民至少還能持有一點實物，因此不如城市勞工對高物價那麼敏感。

由以上的種種現象看來，可見事變中民衆的投入心理，還是以經濟動機為主，一般說來還未出現明確的政治性的自覺。

四·讓我們消化它

二·二八事變的真正悲劇癥結，也許在於衝突的雙重性，以及它所帶來的意義上的混淆性。

事變發生於台灣復歸中國版圖不久，剛由日本殖民地變為中國一行省的體制變革甫行年餘之際，而主持此項變革工作者悉皆來自大陸，則此時的台灣政權，與本地社會相對而言，顯然具有外來性。於是在變革初期的混亂中，官民關係的地緣因素遂被過分突出。簡言之，官與民的統治關係，有產者和無產者的階級關係，一時皆受雙方地緣的掩覆，在群眾的感性認知上，易於變成大陸人與台灣人、外省人與本省人的問題。

然則，政治的統治關係，本質上乃經濟的階級關係的集中表現，兩者是基礎與上層的統一關係。二·二八事變既為一官民武力衝突的政治事件，基本上還是反映著經濟關係中的矛盾。只因矛盾雙方的人事構造，同時又帶有異地性質，則地域性和階級性顯然有所重疊。

再因衝突的主要兩造——一個半封建半殖民地社會的特權資產階級和一個前殖民地的土著資產階級，各因其統戰策略的需要，把自身從屬的階級性刻意隱藏，只突出地域性，把官與民的矛盾、擁有政治特權的大陸資產階級和不擁有完全參政權的台灣土著資產階級的相爭、台灣小資產階級、知識分子、和勞工對新剝削者的反抗，悉皆納入於大陸人與台灣人的相關範疇中。

其實，事變的階級性及地域性縱令有所重疊，但兩者之間當然是以前者為主，而以後者為從，這是不可加以顛倒的一個規律。個中道理甚明，如由兩者關係中抽離了階級性，只從地域性著眼，則一個大陸人只憑其大陸人的身分，當然無法向一個台灣人施其暴壓和剝削，

而台灣人的抗爭對象也並非這樣子「地域性」的大陸人。然若一方為政治經濟的特權階級分子，與另一方的不完全有權者和無產無權者之間，前者暴壓剝削，後者抵抗鬥爭，乃社會的必然運動現象，在此情況之下，兩者的地域性因素也就變得沒有意義。此為首先須要澄清的一點。

其次，所謂的「官逼民反」，也不能只著眼於陳儀等一千人的「逼民作風」「亂紀劣蹟」。而應該透視那一千人背後的「逼民體制」「逼民結構」。換句話說，逼民者雖是那批接收人員，却不全是他們的「作風」問題。而是迫使他們不得不如斯的背景條件。亦即前述的，半封建半殖民地國家機器本身的落後性素質——政治的暴壓性和經濟的掠奪性。

我們可以想像，如果體制未改，即使任用賢良，人民還是會苦不堪言，還是會遇有機會便起而反抗。因為為政者個人操守條件的影響是很有限的，也許他能壓迫得「溫和」一些，或剝削得「徐緩」一些，但他實在是不能不壓迫，不能不剝削。因此我們應該想到，條件不變，制度不改，終究是無官不逼民，無富不剝貧的。

在四十年後的今天，二·二八事變的噩夢實在應該回醒過來了。當年流的血和淚，不論流自那一方面的那一個人身上，都應該是民族的血，民族的淚。那是百年來背負著帝國主義重壓的，一個古老民族的一次無奈自戕。筆者有意越過那場腥風血雨，企圖尋找那種自戕性病變的因由，却無意替任何一位當政者開脫，因為即使骨肉相殘的原罪其來有自，但他們還是推卸不掉引發一次慘禍的歷史責任。只是，受創最深的大眾這一方面，若痛心之餘把一切對抗悉皆加入感性歸類，那無異造出另一個沉鬱的迷思，那才是夢魘成真的不祥之兆。

讓我們以理性和知識來消化過去的所有鬱積，從而驅走未來的任何陰影。

重估戡亂體制

——立法院長

行政院長任期的爭議

民進黨籍增額立法委員黃煌雄在二月初向立法院報到之後，即向行政院提出書面緊急質詢，要求行政院長在新一屆增額立委加入立法院的新會期開議之前，重新徵求立法院的同意，以符合憲法所規定行政院向立法院負責，行政院長須經立法院行使同意權的憲政精神。

之後，黃煌雄與另一位民進黨籍立委在二月十日的立法院「談話會」，再提出建立行政院長每三年向立法院負責的憲政體制。

這個憲政老問題再度被提出來以後，立即引起輿論熱烈反應。除了國民黨決策單位及部份終身委員之外，大部學者甚至於國民黨系統的報紙及立法委員，都傾向於贊成建立行政院長隨立法委員之改選而重新徵求同意。

反對的意見

反對行政院長隨立委的改選而重新徵求同意之理由，着眼於實際政治之運作。

首先，這一派主張，憲法只有行政院長產生的手續與過程，並無任期規定。再者，行政院長由總統提名，經立法院同意後任命（憲法五十五條），因此，行政院長的任期應以總統對他的信任來決定，並不是立委改選後就須重新提名、任命。再依過去卅年的政治慣例，行政院長及各部會都隨新總統之產生而提出總辭，重新改組，習慣上任期與總統相同，所以行政院長正常的任期應為六年。

贊成的意見

主張行政院長應隨立委之改選而重新徵求同意者認為，憲法五十五條的規定恰恰表示：總統之任命行政院長須以立法院之同意為前提，因此，在理論上，總統不可能任命立法院所不同意的人，尤其在政黨政治制度化之後，總統更必須任命在立法院佔多數之政黨所能信任的人，才能出任行政院長。由是，總統的任命權只是形式，且不能以自己的意思隨意任命，否則無法取得立法院之同意，由此可見，行政院長並不是與總統同進退。

另一方面，憲法第十七條

規定，行政院對立法院負責，行政院院長若得不到立法委員之支持，立法院可藉審查預算、制定法律及通過行政院長所不能接受之決議，而逼迫行政院長執行該決議或辭職。因此，行政院長必須與立法委員共進退，才能維持政治和諧的局面。

國民主權的憲法精神

整部憲法之精神建立於國民主權的基礎上。憲法第二條規定，「中華民國之主權屬於國民全體」。立法委員依照憲法規定，每三年須全部改選一次，經過改選之立法院代表最新之民意，行政院長經過代表最新民意之立法院行使同意權之後再執行職務，等於表示其所執行之職務有了最新民意為基礎，這樣才合乎憲法第二條國民主權的原則。

然而由於現在仍處於法律上所謂「動員戡亂時期」，使得這卅多年來政府及行政院之運作並不符合國民主權的憲法精神，行政院長亦因大部份立法委員任期長年延任下去，形同終身職，而成為事實上無法與立法委員共進退，行政院長

/ 張大林

任期的另一個看法

事實上變成隨總統任期屆滿而屆滿。

動員戡亂時期臨時條款

動員戡亂時期源於一九四八年，國民黨政府為應付中共的「叛亂」，乃宣佈全國總動員，國家進入緊急狀態，並於

當年五月十日頒佈動員戡亂時期臨時條款，凍結了甫施行才半年的若干關鍵性憲法條文

。後來，國民黨敗退台灣，並仍誓言要反攻大陸，因此，動員戡亂時期仍予延續下去，並且實施戒嚴，一直到去年十月中旬，國民黨主席蔣經國下令研擬解除辦法之後，戒嚴令

才可望於今年取消。

戒嚴雖即將解除，然而「戡亂時期」仍然持續下去。

由於「臨時條款」的效力等於憲法，因此，行憲四十年來，憲法條文雖未修改，臨時條款條文則不斷增加，由原來的四條，增為十一條。

由於戡亂時期無限期延續下去，臨時條款仍然有效，事

慈林教育基金會 典藏



實上，等於是對憲法若干結構性的條文做出修正或凍結其效力，架空了憲法，改變了憲法原有的精神及政府組織原理。

其中修改最多的莫過於總統權限的變化。

總統權限的變化

總統的權力有限，幾等於是虛位。他固然可以公佈法律及發佈命令（憲法卅七條），但必須行政院長的副署，而行政院長雖由總統任命，但必須以立法院的同意為前提。

總統雖然可以宣布戒嚴及發布緊急命令，但必須經立法院的追認或行政院的決議（四十三條），總統唯一可以自由裁量的權限，只有憲法第四十四條所訂的：

「總統對院與院間的爭執，除本憲法有規定則外，得召集有關各院院長會商解決之。」

由此觀之，我國憲法上的總統是典型的虛位元首。

但經過臨時條款對憲法的修正之後，總統的權力突然無限膨脹，變成掌握行政大權及兼具有發佈與法律同等效力之命令的完整立法權。

臨時條款第一條解除了憲法對於總統緊急處分權的限制。因此，總統在作緊急處分及宣佈戒嚴時，均不必提交立法院追認。

雖然臨時條款第二條規定，立法院仍可根據憲法第五十七條第二款規定之程序變更或廢止之，但事實上，立法委員鑑於本身之利害關係，不會做

出不贊同總統的緊急處分權力的決議，而國大代表亦不可能修改臨時條款第六條第二、第三項而做出不利於本身任期的行動。

因為有權作此決議的立法委員以及制定臨時條款之國民大會代表，其任期皆已超過憲法的規定，超出的任期，立法委員係根據司法院三十一號解釋：由於國家發生重大變故（指動員戡亂時期），在第二屆立法委員未能依法選出集會與召集前，自應仍由第一屆立法委員行使其職權。而國大代表則是根據臨時條款第六條第二及第三項之規定。

則總統之有緊急處分權而又事實不受任何限制，等於掌握了相當於立法權的龐大權力。

緊急處分權的膨脹

一九七八年十二月十五日，美國宣佈與中共建交，並同時斷絕與台灣的外交關係，當時的總統蔣經國先生發佈緊急命令，作停止正在進行的中央民意代表增補選之緊急處分，就是根據臨時條款第二條，在不必送請立法院追認的情形下，停止正常法律之運作。

這項行動並擴大了緊急處分的範圍。按臨時條款及憲法對於緊急處分之施行範圍，本來僅限於「避免國家或人民遭遇緊急危難或應付財政經濟重大變故」或「國家遇有天然災害、瘟疫」等，總統才能經行政院會議之決議，行使緊急命令權。

但前述之美國與台灣斷交

案，乃是一項平常的外交挫折，既不是天然災害，人民亦無須避難，財政亦未發生重大變故，都不算是臨時條款及憲法所界定的狀況，但仍予實行緊急處分權，而立法院及解釋憲法之司法院法官亦未聞對此有所異議，可見總統的職權已因臨時條款之授權，變成隨時可以自由裁量是否行使超越法律效力的緊急命令權，且又不受任何其他的限制。

總統任期及國安會

其次，根據憲法，總統只能連選連任一次（憲法第四十七條），臨時條款則解除此一限制，造成事實上同一個人可以無限期連任下去。

中華民國第一任總統蔣介石先生即連任總統五次，即根據臨時條款而完全架空了憲法對於限制總統任期的意義，也是總統的職權無限擴大的另一項因素。

接著臨時條款第四及第五條授權總統設置動員戡亂機構及調整中央政府之行政機構。

根據第四條就有國家安全會議的設置，並成為「太上行政院」，舉凡一切重大之法案，預算案均需事先經過由總統主持之國家安全會議的核可，再由行政院依正常之法定程序為之。

因此憲法原先以行政院長為全國最高行政首長而對立法院負責的結構設計，由於臨時條款的授權，而使總統兼為國家元首及行政首長，國家安全會議秘書長（由總統任命）便

成爲代替總統處理國家重大行政的太上行政院長。

中央民代的 增補選與遴選

臨時條款除了賦予總統龐大之緊急處分權及無限制任期之外，現行每三年一次之增額立委增補選及每六年一次之國大代表與監察委員之增補選，亦是由臨時條款（第六條）授權總統訂頒辦法，實施補選。

甚至於僑居國外之中央民意代表亦得由總統遴選，等於是總統任命，此一遴選方式，類似於英國國王之任命其國會貴族院之議員一樣，只差遴選有任期，而與貴族院議員之終身職有所不同。

綜上所述，由於「動員戡亂時期」的存在，以及因之而實施的「動員戡亂時期臨時條款」，國民黨政府的組織及權力結構並不完全依照憲法規定，國民黨這種違憲的體制曰「戡亂體制」，但揆諸台灣內外局勢之客觀事實，所謂「戡亂」、所謂「動員」已經是事實上不存在之狀態。

虛幻的戡亂體制

首先，早在一九五七年，中華民國總統蔣介石先生就對當時美國國務卿杜勒斯表示，國民政府已不可能反攻大陸（這項談話文件在十多年前才由美國國務院解密公佈）。可見，卅年來，國民黨政府口口聲聲要「反攻大陸，光復國土」只是用以維持戡亂體制的藉口



。其次，自從中共進入聯合國這十五年來，國民黨政府外交努力的重點，在於確保台灣做爲一個政治實體的事實，能夠獲得國際的默認。最典型的事例是一九七八年美、台斷交時，國民黨政府曾爭取作爲替代大使館之美國在台協會以美國政府機構的形式設立，這項努力終歸失敗，美國在台協會仍以民間機構的形式出現，不過美國政府由國會通過台灣關係法，算是默認了台灣是一個政治的實體。

戡亂體制架空憲法

不論是反攻無望，或台灣作爲一個政治實體，均在在顯示，國民黨政府已經沒有想進行「戡亂」的主觀願望；而客觀事實亦顯示，國民黨政府已卅年沒有「戡亂」的行動。從一九五八年金門砲戰結束之後，台灣與大陸之間已經沒有發生實質的戰爭，更從一九七九年起，連象徵性的宣傳彈砲戰也完全停止，國民黨政府也已採取「戰略守勢」的國防政策，這種和平卅年，而且沒有採取攻勢的狀態，能夠稱之爲「動員戡亂時期」嗎？

除了因「戡亂時期」之存

在，架空憲法的國民主權精神之外，更由於國民黨爲一個革命政黨，以黨建國，以一黨專政實施軍政、訓政，因此到了憲政時期，國民黨的勢力已遍佈了政府、軍隊及社會各階層。又由於長期事實上並不存在的「戡亂」狀態，國民黨勢力籠罩全台灣，不因實施憲政局而有所縮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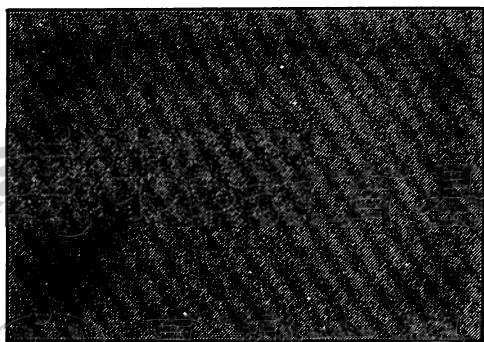
廢止臨時條款完全 回歸憲法

在沒有另一股政治勢力予以制衡的情形下，怎有可能壓迫國民黨停止事實上已不存在的「動員戡亂狀態」，廢止「動員戡亂時期臨時條款」，而完全回歸憲政呢？

總而言之，朝野在爭論行政院長是否應隨增額立委之改選而重新徵求立法院之同意的憲政問題，事實上，即使行政院長依憲法精神建立與增額立委同進退的制度，仍只是回歸憲政的一小步，若要完全恢復憲政常態運作，必須對於恢復憲政常態的障礙一人爲的「動員戡亂時期」予以重新界定，俾使其不與現實脫節，那麼，充分的回歸憲政才有可能實現。

環境權

/ 許思元



對於這個冷酷的事實，凡是蒙受傷害的個人或群體，被迫在「強制性環境」中採取自保行動基本法權觀念，便是所謂的「環境權」。

環境權的由來

環境權也常被定義為「享受良好環境的基本人權」，這樣的主張在一九六九年首次出現於美國學者的論文中。

一九七〇年三月，「公害問題國際討論會」在日本東京召開，會中宣告了「東京決議」。該項決議的第五項中有下述的宣言：

——尤其重要者，任何人都應該擁有不被戕害的環境的權利，和關切這一代應留傳給未來世代包括自然美在內的自然資源的權利。我們要求，以此項權利做為基本人權的一種，而確立於法律體系中。這項決議案出於美國密西根大學薩克斯教授之提議。從此，環境權一詞便廣被傳播媒體所使用。

環境權的定義

環境權乃公害時代法律上的大眾生存權。

自工業革命後，因為生產項目的多樣化，種種技術性的環境變形，造成了所謂的「強制性生活環境」。也就是說，人類在生產過程中所造成的破壞性壓力，逐漸弱化了自然環境的恢復與再生的彈性，其結果是引發了生活在其中的個人的持續性精神緊張，和肉體的病理反應。

工業文明已經破壞了人與自然之間的和諧與平衡，並逐漸把人類社會的生存型態逼上毀滅的不歸路。人類必須痛苦的面對社會結構中的一個新矛盾——社會中握有生產工具的某些個人或集體，為了對於利潤的永不餓足的貪欲，不擇手段地以扭曲和破壞生活環境的途徑，來扭曲和破壞生活環境。

生活環境的內容

至於「生活環境」的具體內容，依據日本「公害對策基本法」二條二項中所規定者為：

一和人的生活有密接關係的財產，包括土地、房屋等不動產；衣類、家具、商品等動產

二、和人的生活有密切關係的動植物，例如魚介類、家畜、農作物等等。

三、此類動植物的生育環境，如魚介類產卵場所等。

值得注意的是，該基本法雖言明以保護國民健康，保全生活環境為其立法目的，但對於保全對象的生活環境却限定為「和人的生活有密切關係者」，餘如原野海洋等，則被棄置於規定範圍之外。這一點，反映了立法者替未來的企業擴張預留地步的心態。

東京決議雖正式提出環境權的法權觀念，至今却仍未被各國政府所接納。雖然各國都有進步的法界人士不停地奮鬥爭取，如日本大坂律師協會的律師集團，最近積極主張，做為被害者的「當然邏輯」，環境權應該具有「絕對權利」的優先序位。

屢遭挫敗的環境權

但在至今為止的判例中，却常以「承認環境權將使行政權陷於癱瘓」為理由，拒絕加以採納。如一九七四年日本東京高等法院對「東京國立市步道橋事件」的判決文件中，有這樣的說詞：

「凡行政上之措施，應由公共利益之見地出發，綜合考量利害得失，然後決定。然當其

實施時，欲取得全體之贊成支持，實屬困難。蓋某一措施之推行，使得一部分住民蒙受不方便或不愉快，為經常無法避免之情況。若此一部分住民，以環境權為由，冀以司法手段阻止該項措施之實現，勢將導致有礙公共利益之結果」。

此外，在「山陽汽車道事件」判決文中也說：

「控訴人主張本計劃的實施將侵害彼等之「環境權」，然所謂「環境權」的法律根據迄未澄清……權利概念未明，殊難逕行採決」。

完成立法有待努力

以上，環境權的爭議，大抵集中在權利主張的妥當範圍如何確定。但施工的一方常用「公共利益」「忍受限度」為由加以反駁。如果是政府工程，更往往以行政權為其護身符。即使是民間企業，也每因公害來源方面存在著「所有權」的物權而窒礙難行——當「非所有權者」的多數受害人以環境權要求限制「所有權者」的公害行為時，除非該項公害已到立即可見的嚴重程度，否則多數判例仍不免偏袒所有權者。

在以私有財產權為基礎的社會中，環境權仍有其難以克服的法權障礙，以致目前仍然停留在人道主張的階段。

現場報告

最後的農民

——美濃菸田採訪記

/ 張 粟

經過將近一年反覆的談判，國民黨政府終究還是向美國妥協了，從今年一月起，開放洋菸洋酒進口。

還是進口了

在經濟上長期依賴美國的國民黨政府，向來是美國人怎麼開口就怎麼答應的，為什麼這次談判却拖了這麼久呢？禍國殃民的核電廠；打擊糧食價格、當然也就打擊農民生活的美國糧食都順順利利的進入了台灣，為什麼獨獨菸酒却例外呢？這當然是因為菸酒公賣事業，是國民黨政府的國之大本，是它最賺錢的國營事業的緣故了。

國民黨這次為了維護菸酒公賣的國家壟斷利益，可以說是耗盡了心血，先是要換湯不換藥地坐收重稅，然後是施加不准廣告的限制，企圖予以阻撓，後來，甚至連它冷凍已久的民族主義的法寶也祭出來了，彷彿是在挽救國族之危似的，大搞「拒抽二手菸」運動。

前方雜誌 '87年3月號





抽國產菸長壽

去年七月，《當代》雜誌上就刊了這麼一則廣告：

不抽，是為了抗議
洋菸進口的背後故事是：
美國人要我們買他們已漸漸不
吸的洋菸。
……

洋菸公司準備在未來幾年內，讓亞洲地區成為他們香菸的主要供應市場。

這份廣告一方面勸民衆不要抽美國香菸，另一方面却置壟斷國內香菸市場幾十年的國產菸於不顧，好像是在說：抽洋菸有害，抽國產菸則「長壽」。

誰承擔惡果

但是，洋菸洋酒最後還是開放進口了。國民黨政府的忍痛割愛，正是它在經濟上依賴美國的必然惡果。是誰來承擔這個惡果呢？

洋菸洋酒開放進口，公賣局雖然勢必多了競爭對手，可能面臨利潤減少的事實。但公賣局的利潤，本來就是靠國家政權的力量在經濟上壟斷榨取超額的暴利。公賣局憑著壟斷體制一方面獨佔了國內菸酒消費市場，另一方面又成為菸酒原料——菸葉和葡萄——的唯一買主，使菸農和葡萄農的經濟生活完全受制於公賣局。

真正的受害者

是誰承擔了洋菸酒開放進

口的惡果呢？當然就是這些經濟生活受制於公賣局的菸酒原料生產者了。

對於菸農而言，洋菸洋酒開放進口以前，由於公賣局是他們唯一的買主，所以唯有接受所謂「保證價格」。在這保證價格之下，菸農的收入比起其他作物的農民來，誠然要好，但這也只是因為在工業發展中被犧牲掉的其他作物的農民被剝削得太澈底的緣故。相形於公賣局的暴利，菸農的那麼一丁點利潤却又微不足道了。

立即的影響

開放洋菸進口後，菸農連以往這種「不幸中的小幸」的情況也保不住了，如這期菸作，凡委託種植面積超過四分地以上者，均削減一分地的種植面積。委託面積的產生，是公賣局控制菸葉外銷產量的作法，如果外銷情況不好，公賣局隨時全面收回委託面積，並不受菸葉種植權的約束。

農民的反應

種菸有四十年經驗的菸農鍾紹坤先生，在素有菸草王國之稱的美濃鎮裏，和其它近二千多戶菸農一樣，心底都暗懷著深深的恐懼，目前，正是秋菸的採收期，菸行間採菸婦人的笑聲，暫且沖淡了這份不安。「開始談判時，看到政府堅持的態度，我們菸農都抱著極大的希望，誰知選舉一完，政府做出退讓的決定後，大家真是失望得說不出話來。」鍾

先生說：「當然，政府有他的立場，不過這個立場站得令我們不服，怎麼可以犧牲農產品，去平衡貿易逆差。」。

金色葉子的魔力

大約六年前，鍾先生花費了二十餘萬元改裝「菸改社」引進的日本堆積循環烤菸機，代替傳統的土窯，於是工作效率提高、技術性操作方便、縮短烘烤時間，使得菸葉色目更加均勻，也解決了農村勞動人口老化、不足的現象，因為降低了生產成本，收入也相對地



比從前增加。

「否則，沒辦法生活啊！
種稻價格低，兩季稻作所得不
及菸作利潤的五分之一，改種
其它農作物風險又大，進工廠
，這個年紀了，哪有辦法？」
鍾先生自豪的表示，靠著這些
烘烤後有著金黃色澤的葉子，
他培養了六位大學生。

菸草的培育

培育菸草，從幼苗到茁壯
的過程中，菸農付出的心血，
不下於照顧一個嬰兒。

「記得某一年夏秋時節，



上圖：菸農鍾紹坤先生

下圖：菸葉的收割工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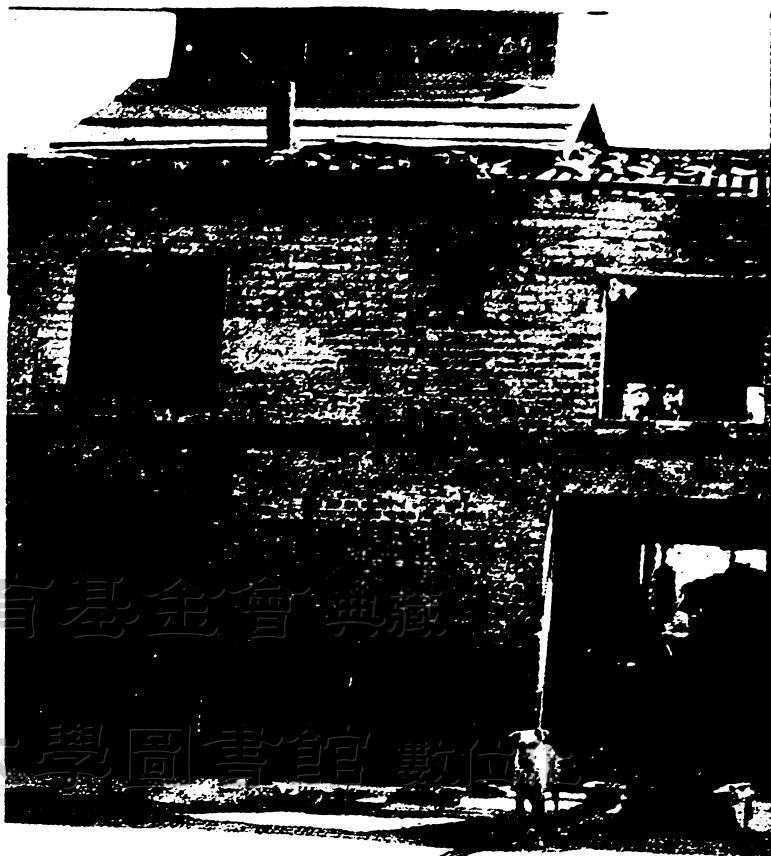






右圖：廢棄的老式菸樓

左圖：菸葉的栽培需要大量的農藥



有一天午后，突然下了一場冰雹，當時我還在唸國二，整個下午根本無心上課，因為擔心脆嫩的菸苗受到冰雹的摧殘。」鍾先生剛上大學的女兒回憶著，「結果下課回到家裡，看到父母親眼中悲痛、茫然的神色，心裡好難過。」

農人靠天吃飯，天氣是決定菸葉品質好壞的最主要因素。春菸品質好，可以比美洋菸，雖然公賣局一再輔導菸農改

種春菸，但大多數菸農還是不敢冒然嘗試，因為台灣氣候不穩定，如果雨期來的早，春菸受到雨水的浸泡便完了，而且採收期日照強烈，不宜工作。

而秋菸靠著菸農經驗的累積，和熟練技術的配合，品質也有日漸提高的趨勢。問題在於公賣局生產效率的低落和機器設備的老舊，造成國產香菸品質粗劣，加以專賣行銷網的不健全，如今一開放洋菸進口，國產菸便不堪一擊了。

應戰的策略

屏東菸區菸農選出的分社長吳連火先生表示：「美菸進口後，將不減少種菸面積，而以輔導菸農降低生產成本，提高菸葉品質，迎接洋菸的挑戰。」

其次，他也補充了產量限制和提高價格的方案—菸農為求產量增加，加施氮素，結果「增產」了很多厚實胖大，但却沒什麼菸味的菸葉，如此一

採菸的隊伍

南台灣冬日有陽光的溫煦天氣正適合採菸。午後約一點鐘左右，採菸的隊伍陸續出發，筆者尾隨鍾先生的四輪拼裝車，同往離他家三公里外的菸田。

一到菸田，採菸婦女嘹亮、噪雜的聲音正在談論着昨天晚上鎮上慶祝元宵的熱鬧場面。這個由六戶菸農共同組成的「換工」隊伍，十八個人正在熟練地進行採收菸葉的工作。

「不比你們到外面讀書做事的年輕人啊，我這個年紀了，還要在這兒採菸，辛苦啊！」說話的是六十多歲的羅龍妹女士，她是以每天三百元的價錢，被勞動力不足的菸農僱請來「換工」的，由此可見農村人口的老化情況。

在工作現場的菸田，筆者輕易地感染到勞動所散發的興奮律動，這群辛勤的菸農，頭頂著藍天，腳踩著泥土，看似歡樂地勞動著，但遠處的天空正有一大塊黑雲向他們移來，不久就籠罩到他們頭上了。

最後的農民

菸農是台灣唯一受到保護政策之利的農民，當其他作物的農民早已深陷於赤字經營的深淵時，只有菸農還能從專賣壟斷制度中分取少許利潤。若說菸農是台灣「最後的農民」也不為過，現在，連這台灣農業「最後的」障地，也被帝國主義攻陷了。



來，固然增加了生產成本，但却降低了菸草的收益。

「其實，菸農的心理我們能夠理解，菸價在這三年內不但一直沒有提高，却反而跌落，於是菸農便只好從增加產量下手，謀求補救之道。」吳先生說：「提高價格，這些問題便都解決了。」

公賣局改制

談到經革會提議將公賣局改制為公司，開放民營的構想

，吳先生大表反對，他的理由是菸農從此便失去了原有的保障。

「一旦改由民營，那麼，菸草就要像果菜市場的蔬果一樣，盛產時價格低到成本以下，缺貨時又任令中盤商哄抬，生產者什麼好處也沒得到，到時，菸農可就慘了。」菸農張紹富這麼表示。

但在「國際化」「自由化」的政策下，公賣局改制却已勢在必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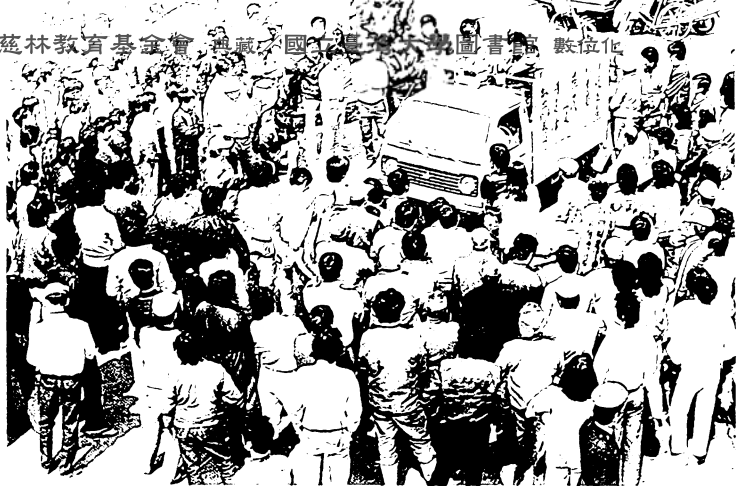
封面故事

向魚蟲進軍

——東港漁民



的抗議活動 / 洪田浚



浩浩蕩蕩的抗議隊伍

對東港漁會冒貸案的受害者來說，不斷的抗議，是他們唯一的武器，從法院到國民黨中央黨部，再到漁會，再到漁蟲們的家門口……。

今年春節剛過，新年的氣息尚未褪盡，一群社會運動人士，陪同多位苦主，頂著鹹濕的海風，開往東港漁會，向吃人不吐骨的吸血蟲們，展開悲憤的控訴。

隊伍到達時，已經有許多當地的漁民在等候。東港鎮的大街小巷，貼滿了抗議海報，號召民衆前往漁會聲援的麥克風，隨著宣傳車，穿梭在鬧區中，吸引人羣的注意。

除夕當天，受害者就把趕印出來的傳單，張貼在鎮內醒目的地方，漁會之前，陷害漁民的漁會幹部住宅附近，學校、市場、戲院等地，要讓壞人不好過年。可是，壞人們花錢僱工，把所有傳單在除夕當天完全撕掉，以為這樣他們就可以做鴛鳥了。

抗議活動的前一天，也就是二月二日，海報和傳單又大量張貼出來。這次，沒有人去撕除，漁會幹部們風聞而逃，不曉得躲到什麼地方去了。

長期支援受害者進行司法鬥爭和自力救濟的姚國建，告訴工作人員說，東港分局早一天已經傳話過來，可以到漁會門口演講抗議一個小時，但不可以衝進漁會裏面。姚國建透過苦主回話，表示演講兩小時，可以不衝進漁會。

支援隊伍包括：姚國建本人、以及陳秀賢領導的高雄民主工作隊、高雄市漁船船員、鬥士賀兆雄、船員運動家林美瑢和報紙雜誌的記者四、五人。

受害人則有四條船被冒貸的苦主林啓智等十餘名，他們有的到高雄接運支援人員，有的到漁會現場佈置，等候抗議隊伍的到來。

上午十點左右，抗議活動開始了。二十餘名警察在漁會門前佈點戒備，漁會的門口更派遣兩名站崗，群眾則禁不住興奮起來。

姚國建首先演講，開啓了東港鎮有史以來第一次社會運動與自力救濟行動。他要求漁會幹部出來辯論，證明自己的清白，然而，漁會幹部早已逃得不知去向，只見所有漁會職員從二樓窗口探頭出來，好奇地看熱鬧，一副幸災樂禍的景象。

冒貸案不是空穴來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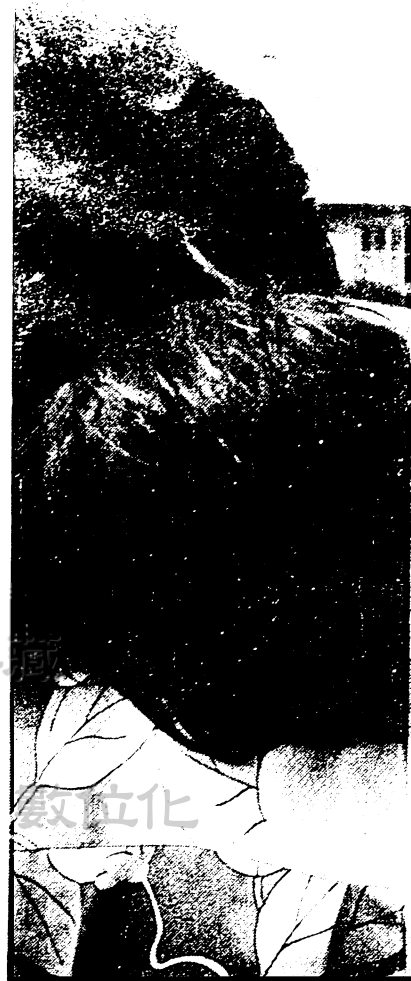
姚國建進一步說，屏東地檢處已經把勾結漁會幹部從事冒貸的造船公司負責人，起訴兩個人，可見冒貸案不是空穴來風。尤其是，冒貸案發生以後，已經冤死了兩名苦主，另有一人受重傷，受害人及其家屬絕不會善罷甘休。

陳秀賢接著把冒貸案發生的經過，一一加以分析。冒貸

案已知發生四案，都是漁會勾結大一統造船公司，盜刻漁民印章，利用各種名義騙取漁民的身份證，然後裏應外合，貸走了三千萬元左右的鉅款。

受害人林啓智，以及死者陳進士的太太楊繡香，加上兩名婦女，葉再成的太太許玉柳，陳清泉的太太黃心，先後上台指控。

最值得注意的是，在演講的最後，一名婦女主動上台，提出新的控訴，揭發了另一件未爲人知的冒貸案，使抗議活





動達到了高潮。這名婦女就是黃心。

上台控訴的受害人前後共四名，一名男性，三名女性，而女性都是受害家屬。由此可見，自力救濟行動中，婦女佔著非常重要的角色。

四件冒貸案的發生經過如下：

一．盜刻印章部份

(甲案)

六七年二月三日，黃國雄



上圖：在遊行車上的陳秀賢。

下圖：死難漁民陳進士的太太楊繡香的控訴。



上圖：抗議演講的盛大場面。

下圖：聽眾神情專注。





盜刻其表弟吳順達印章，以之貸款三十二萬元，並為連保人。

六八年八月，黃國雄未再繳付貸款利息，因而使吳順達閉門家中坐，禍從天上來，但他尚被蒙在鼓裏，不知大禍已臨頭。

七一年三月，漁會向法院申請支付命令，吳順達始知受害。

七二年十月十三日，吳順達、吳莊蘭夫妻喝農藥自殺，激烈抗議，吳順達重傷被救，妻亡。

七五年六月十九日，吳順達與東港漁會達成和解，由吳順達償還被冒貸的餘款十九萬

二千二百四十九元，這真是天理何在！

(乙案)

六七年三月廿四日，蔡金泉盜刻許登樹、蔡騰芳、李春發、蔡中江等四人印章，各貸得三十二萬元，計一百二十八萬元，並使之互為連保人。

七一年七月十六日，蔡金泉夫妻向警方和法院坦承盜刻印章事，蔡以偽造文書被判刑六月，但漁會仍對被害人催繳被冒貸之款。

二·嘉春號案

六八年五月，大一統造船公司在未向屏東縣政府申請建

造「嘉春號」，也未申請船隻設籍領證的情況下，擅自與漁會勾結貸款造船。

六八年六月廿三日，大一統總經理林漢清到漁會辦理「嘉春號」貸款，以林啓禎、呂松猛、呂湖北、伍孟春等人的名義，每人貸款四十萬元，林漢清並偽造林啓禎的貸款本票，另填具兩名林啓禎不認識的保證人。

三·進士福號與明富吉號案

六九年四月，大一統公司董事長許洞文向陳進士、葉再成、陳良雄、許坤派、許坤入



右圖：受害漁民林啓智在分發抗議傳單。

上圖：除了監獄、刑求，你們還懂什麼？

下圖：在寫著「為漁民伸張正義，打倒惡勢力」的標語前面，一臉無奈的阮國建。



等五人表示幫他們代辦所得稅免稅，而騙取身份證、私章及印鑑證明，以此申貸建造一五〇噸的「進士福」號及四〇噸的「明富吉」號漁船，共計貸

得一六五萬元。

七三年十月，陳進士等人發覺被冒貸，聯名向各有關機關陳情，檢舉漁會與大一統勾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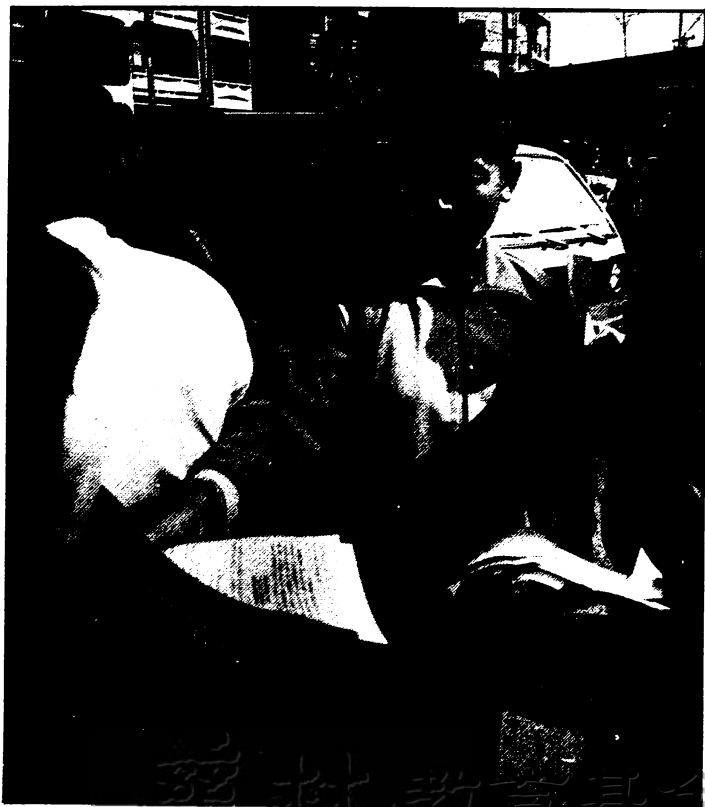
七三年十一月廿一日，屏東縣政府函告省漁業局，該兩艘漁船至七三年十一月均未建造

七三年十一月，漁會承辦員林豐仲向縣府調查人員稱，曾經實地勘查兩艘船的船殼，及標明的船名。

七三年十二月七日，縣府函漁業局，「進士福」號並未向該府申請建造。

七三年十二月八日，漁會總幹事林德和向新聞界聲明：

1. 漁民為賴債而無中生有，企圖破壞漁會形象。
2. 辦理貸款的各項手續均完備，漁會審核非常認真。
3. 船未造好公司即倒閉，應與漁會無關。
4. 該兩艘船未建造，省漁會通知區漁會收回所有貸款。由此可知，船確實未造，



錢却被大一統公司領走了。

七四年三月六日，屏東地檢處首開調查庭，偵訊中，林奮發（科長）、林豐仲却承認：大一統並未造船，漁會承辦人也沒有驗收漁船，就直接把貸款交由許洞文領取，再由許開具十四張連號支票付貸款利息。

檢察官魏新知將林奮發、林豐仲以貪污罪提起公訴。

七四年八月十九日，屏東地院判決林奮發等無罪。

七四年九月五日，陳進士因受刺激，長期失眠，而致發高燒至四一·二度，持續不退。

七四年十一月廿日，陳進士不治病故，在昏迷中數度大罵：林奮發啊，我沒領錢，我若死了做鬼也要拖你去。

四·嘉春三號案

七二年三月，林啓智委託大一統建造「嘉春三號」，並交訂金十萬元給大一統公司林漢明廠長。

七二年三月卅一日，林豐仲為方便林漢清提前取得貸款，在林啓智的貸款申請書上填寫：確實建造大一統 TTI 65 型，省能源漁船乙艘，在該船未造之前，林漢清即持統一發票，以林啓智名義向漁會貸款。林豐仲未按貸款規定，即讓其領走貸款的七成，計九十一萬元。

七二年五月，大一統公司突告倒閉。

七二年七月二日，因大一統倒閉，林啓智只得自購造船

材料，僱工建造，至十月底完工。

七四年二月，漁會向屏東地院控告林啓智拒繳貸款本息。

七四年四月十二日，屏東地方法院判決，林啓智不必負償還貸款之責任。

七四年三月十八日，屏東地院民事庭，進行言辭辯論，漁會理事長陳成田表示：錢是交給大一統公司，亦是經過被告太太同意。

糾纏不清的官司

在台南高分院：

東港漁會職員莊美鑾作證，指林啓智曾在七二年六月一日，到漁會繳貸款利息，林却提出漁民出海證明，證實當天在海上作業。承辦推事却採納莊女之證詞，判漁會勝訴。林不服上訴最高法院，仍採莊女證詞而敗訴。

七四年九月，林奮發向自立晚報記者說，漁會先以電話徵得林啓智同意，才將九十一萬元貸款交給大一統公司。

大一統造船師傅陳武雄在偵察庭說，七二年七月初曾為林啓智造船，檢察官却故意在不起訴書中改寫成七十年七月。

七六年一月，林啓智向屏東地檢處控告林奮發、林豐仲偽造文書。偵察庭中，林德和、林漢清作證，指林啓智帶林漢清親自在林德和面前簽章，同意林漢清代領貸款，檢察官採納此一證詞。

結果：許洞文、林漢清被依侵佔罪嫌起訴。林豐仲、林



奮發不起訴。林啓智不服其中不起訴部分，向台南高分院申請再議，結果相同。

然而，林啓智的房子被漁會查封拍賣。

走上自力救濟之路

七六年二月三日，林啓智等受害人由姚國建、陳秀賢陪同，在漁會前演講示威。

過去，林啓智等人，曾向調查局、法務部、內政部、財政部、監察院、行政院、總統府、中央黨部等單位陳情檢舉，結果都是徒勞無功。

據悉，漁會是將所冒貸的金額，與大一統人員朋分後，交由縣黨部作為候選人輔選基

金，前任國大林水破的當選，與此有關。

因此，各有關單位都知悉本案，省黨部主委關中對本案下過一番心血，關照各有關單位網開一面，以免牽連到縣黨部，抹黑了國民黨辦選舉的「贏的策略」。

抗議活動在輪番的演講、呼叫聲中持續著高潮。十二點一過，東港警分局分局長鄭章雄頻頻勸說，要求停止活動，認為時間已經拖得太久了，陳秀賢即以麥克風公開質問：

「東港冒貸案的受害漁民，自民國六十七年到現在將近十年，每天受著家破人亡的痛苦煎熬，十年都不算久，才抗議一個上午怎麼就說久？」

並當場宣布下午要到分局去「拜訪」，要搞清楚負責地區治安，維護地方安寧的警方，到底是站在加害者的漁會一方，還是站在受害者的漁民一方。

整個活動也就到此結束了。

尾聲

下午一時許，姚國建、陳秀賢、邱國禎、楊錦昌、劉義雄和受害漁民林啓智等一行人，浩浩蕩蕩地到了東港警察分局，開始了「拜訪」活動。

分局長要前來「拜訪」的一千人等應尊重司法判決，並指責帶頭抗議的陳秀賢、姚國建等人挑撥是非，製造混亂，



因為有關方面已經透過適當人選，安排漁會和漁民雙方進行協調，希望就此達成和解。陳秀賢當即反問：

「既然要尊重司法判決，那麼這些受害漁民都已經敗訴了，就應該強制執行，查封財產，該坐牢的也要去坐牢，為什麼還要安排私？」弄得分局長無言以對。

這樣去分局內彼此爭論了四十分鐘，平添不少熱鬧氣氛，但對問題的解決，並沒有什麼直接的效益，而這群不受欢迎的訪客也在兩點左右離去了。

看來，擺在受害漁民面前的，還是一條漫長的自力救濟之路。

前方雜誌 '87年3月號



左上圖：姚國建、陳秀賢在東港分局與分局長鄭章雄針鋒相對。

右上下圖：楊繼香（中）與分局長理論。

失業率與你

/ 方 達

對「身分」的確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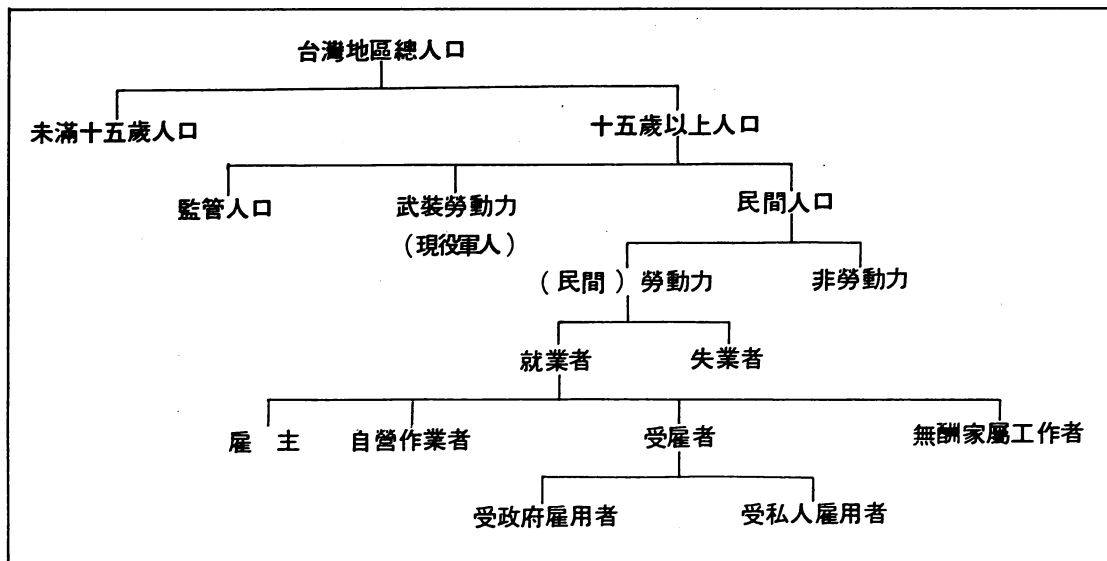
失業率是一個抽象的數字，也是一個在真實世界不存在的數字，它所以被我們認為是存在的，而且使我們相信它，其實是一個廿世紀的神話。

從一社會的勞動力之分類的角度看，失業率是廿世紀的神話，在作失業率的定義之前，我們應該對這個社會的總人口有基本的認識，也就是說，

在這個社會的總人口裏面，我們要對這些人口的「身分」有一基本的認識，然後才能夠談失業率這個名詞。

如果依據行政院主計處的分類，台灣一千九百多萬人口中的每一個人，大抵都可在下面圖表裏面，找到自己的身份：

勞動力之分類



由圖表可了解到失業率的產生，計算失業率是扣除了以下的人口來計算的：

- (一)未滿十五歲的人口。
- (二)監管人口（即被拘禁之人口）。
- (三)武裝勞動力人口。
- (四)非勞動力人口：(a)料理家務者，(b)學生，(c)被收容者，(d)衰老殘疾不能工作者，(e)其它。

所以我們的失業率是僅僅從八百多萬就業的人口裏去統計出來的，也就是說，我們目前的失業率已經假設到全台灣的就業人口僅僅應該有八百二十六萬人（1986年8月），只有這些人失業的話，才叫做失業，並由這組人口裏出現了失業者，才產生了所謂的失業率，因此，我對失業率這個名詞，至少要有以下的幾點了解：

- (一)它是一個具有「觀點」的數字。
- (二)它是一個具有隱藏性的數字。

因此，我們看到台灣的報紙報導台灣社會的失業率的情形時候，我們務必要有幾個基本的認識，也就是說，失業率它固然可以做為我們了解台灣的一個參考數字，但是這個數字並不是一個一般性的數字，也不是一個絕對的數字，它只能夠在相對上讓我們對八百多萬台灣的就業人口，提供一個相對的參考。

失業率的調查方法

從調查方法和抽樣資料估計來看，失業率也是本世紀的神話。從社會人口的分類來看，我們已知失業率是一個隱藏性的數字，那麼在這裏我們要繼續討論的是失業率的統計方法，從這個角度來看，我們也可發現這個統計方法本身也會造成失業率這個數字的不準確，依據行政院主計處表示，目前調查失業率的方法和調查的實際情形是調查時期定為每月辦理一次，以每月十五日那一星期為資料標準週，而於次一星期調查標準週發生之事件，並以標準週之最後一日午夜十二時正為分界，調查和校正各種人口異動情形，在此時死亡或遷出者不予調查，而以後死亡或遷出者仍應調查，然而我們發現行政院主計處的這種方法，以及它的實際操作，在實施上有相當大的困難：

第一，它的調查的樣本，大部份是採用既定的方法抽樣取得，而其中有關水電煤氣業的部份，則是由各業的各公司每月提供資料，逕送有關單位使用，因此我們可以理解到行政院主計處所根據的許多就業情形的資料，實際上在抽樣的前題下，必然不可能是絕對客觀的標準，因為各行各業的業主本身在處理這個資料的時候，已

經因為自己的立場以及自己的需要，而使得這個數字發生了變動。

第二，關於共同事業戶的處理資料也有困難，因為行政院主計處所使用的共同事業戶的資料，它是以各村里共同事業的人口數為抽樣母體，以人為單位，然後根據總抽出率的千分之四直接抽出進行調查，那麼只有千分之四直接的抽出也表示這不是個一般性的數字，而是一個抽樣選擇而產生出來的數字，它的有效性也因此值得我們去懷疑。所以行政院主計處曾經自己表示過它的估計數字會有誤差，然而他在解釋這個誤差的時候，是這樣子表示的：勞動力調查統計結果由樣本表徵逐段估計產生，除了人口總數，以及十五歲以上人口等數字係依據週期現住人口統計資料，所以沒有估計誤差外，其餘各項表徵估計值，因受機率變動影響必然會有差異。

因此我們可以知道，台灣的失業率，是經過抽樣方法來選擇得到的，是用抽樣方法來得到它的計算資料，那麼這個資料所統計出來的數字，它一定跟我們的真實社會所顯現的事實有相當的距離。

失業者 and 就業者

從「失業者」和「就業者」的定義來看，失業率也是一種神話。什麼叫做就業者？具

備了什麼條件才算是就業者？一個月工作三小時能不能算是就業者？一個月只工作八個小時能不能叫做就業者？因此我們在看失業率的時候，我們一定要注意，一個社會在統計失業率的時候，它對就業者以及失業者的定義是什麼，我們才可以真正知道失業率的真正的意義是什麼。在臺灣，就業者的定義是指在資料標準週內從事有酬工作或從事十五小時以上無酬家屬工作者，這個定義可以說非常含混，因為什麼是有酬工作者？如果一個人一個禮拜做家教做了四小時，他是有酬工作者，但是他又是大學生，他在統計資料上來講，他是不列入就業或失業考慮的對象，但是他在一週內却從事了四個小時的工作。另外，有一個家庭主婦，在家裏每天要做十個小時以上的塑膠花，那麼她一週的工作時間已經超過六十小時，可是她因為沒有做到十五小時的無酬家屬工作，那麼她可能還算是一個失業者。

在臺灣，因為「就業者」是個定義非常含混不清的名詞，使得我們在看到失業率這個數字的時候，不得不對這個數字產生某種程度的質疑。

現在，我們再來看台灣對「失業者」的定義，它是指具有工作能力及工作意願，但在資料標準週內却不能獲得有酬工作，亦未從事十五小時以上無酬家屬工作，而正在尋找或等待工作的人，包括恢復工作



者，以及找到職業而未開始工作，亦未領有報酬的人，這個定義裏面有幾點事實值得我們提出來討論。

「就業」的真正意義

一個就業者，作為一個能夠靠著工資去換取生活資料，以便能夠在第二天繼續進行生產活動的人而言，上述的定義也有它極明顯的瑕疵，也就是說，如果有一個人，他一個禮拜工作了十六小時，那麼在定義上他是個就業者，但是，這十六個小時的工作所得，根本不足以維持他最起碼的生活資料，那麼，這種「就業」除了在統計數字上拉低了台灣的失業率外，還有什麼其他的意義嗎？

因此我們發現，在一個社會裏面，它所公佈的失業率數字常常是當權者的一種統治方式。例如在某一個時候，政府所以把失業率提高，主要是因

此增加憂慮意識，以便利推動某些對人民有較高度要求的政策；相反地，在某些情形下，政府公佈非常低的失業率，那麼這種較低的數字可以向人民顯示，這個政府是一個高效率大有為的政府，所以失業率這個數字對人民沒有意義，但對政府却有極大的意義。

客觀的失業率

如果真正有一個客觀標準的失業率存在的話，我們應該怎樣認識它呢？

過去曾經有這樣一種說法，在資本主義社會裏，由於科技的不斷發達，使得生產方式從人工化而逐漸地機械化，從機械化而逐漸地自動化，從自動化而逐漸走向完全不需要人工操作的地步，如果資本主義社會依循這樣的方向發展，它將在一個歷史階段之後，使得資本主義社會的失業率趨近於百分之百。

另外，也有一個與前者完

全相反的社會體制，姑且名之為「社會主義」社會，社會主義社會的生產方式是要消除生產關係的矛盾，因此社會主義如果實現的話，它將致力於使失業率趨近於零。

關於上述兩種說法，我們不妨這樣說，如果社會主義真的要致力於消除失業率，而資本主義在另一個極端要造成百分之百的失業率的話，到目前為止，都還只是一種理論上的可能。因此，如果說我們的社會上存在著客觀標準的失業率的話，那麼，我們應該如何來認識它呢？

「勞動力市場」 的勞動力交易

要認識這個數字，也許我們先要認識「勞動力市場」這名詞，在勞動力市場裏面，大致上可以分成兩種人，一種是購買勞動力的人，另外一種是出售自己勞動力的人。前者就是資方，後者就是受薪階層，因為勞動力市場有需要買勞動力的人，也有需要賣勞動力的人，於是「勞動力市場」這個東西就這樣應運而生了。

因為有了勞動力市場，勞動力就會在這個市場上出現一個價格。假設在一個勞動力市場上，所有的資方買下了所有的勞動力，也就是說這個勞動力市場所有的賣方把他們的勞動力全部賣出了的話，那麼這個勞動力市場在完成了全部交易之後，就會因為機能喪失而不再存在，沒有任何一個資方

還會流浪在這個市場上尋找他要買的商品（勞動力），也沒有任何一個受薪者還會徘徊在這個勞動力市場上而找不到買主。在這種情形下，如果我們把它設定為一種純粹狀態的話，那麼在歷史上從來也沒有出現過這種純粹狀態，因為對資方而言，純粹狀態是絕對不利的；原因在那裡呢？從資方的立場來看，如果勞動力市場上能一直維持著一部分的失業人口的話，便表示了勞動力的供給大於需求，依照供需率的作用，資方便可以在這種情形下付給較低的工資，同時也可以不斷地淘汰他所不需要的工人，補充他所需要的工人，同時又不增加他的支出，那麼，便可以提高企業的獲利率，所以資方觀念中的理想境界是勞動力市場絕對不應該發生剛剛我們所假設的「純粹狀態」，而應該永遠保持一定的失業率，因此，他們便要把失業率的存在加以合理化。

「失業率」的政治意義

當我們認識到這個事實之後，更應該了解到我們從新聞媒體上所看到的一些有關失業率的報導其所代表的意義。比如說，美國現在失業率那麼高，雷根上台之後說要想辦法加以解決，我們千萬不要天真地以為他真的想使美國人都能充分就業，這顯然是無法實現的事，而且也根本不是雷根的想法。

如果一個社會的失業率已經高到足以造成危機的程度，政府當然就會想辦法來解決這個危機，但是這個解決危機的辦法並不是要使失業率消失，而是要使失業率降低到一個安全的範圍之內。以台灣而言，台灣的失業率如果提高的話，無論如何都是資方不利的一個訊號，主要的原因是台灣是一個完全仰賴國外市場而生存的一個經濟單元社會，台灣為了能夠在國際市場上競爭下去，所最缺乏的就是先進的科技以及雄厚的資本，那麼在這種情形下，它只能以密集的勞動力來彌補這兩項缺失，因此必須讓所有的勞動人口都被有效利用，才能彌補科技以及資金的不足。在這個情形下，台灣絕對不允許出現很高的失業率，去年政府公佈的失業率已經達到百分之四，我們可以想像得到，台灣的官僚資本家內心是如何的焦慮。

由以上的論述可知，「失業率」對一個工人是沒有意義的，既不成為失業者的就業指南，也不能讓已就業者加薪；但對資方却大有用處，因為失業率高低可以做為剝削強度的指標，以及更新設備的參考，它對政府也是有用的，因為過高或過低的失業率對經濟活動顯然是不利的因素。

雖然是相同的事物，但因為不同的立場，必然會有不同的看法，我們必須認清自己的立場，不必再被那些數字魔術般的「失業率」所迷惑。

到團結之路

——南韓勞工·

前言

一九六〇年代起，在僅僅二十年期間，南韓由一個典型的低度開發國家，變成了具有代表性的新興工業國家（NIC）。的確，八十年代南韓的產業構造是：第一次產業一五·八%，第二次產業是三五·四%，第三次產業是四八·七%，約略具備了「先進國外貌」了。GNP自六二年的三五五〇億圓，昇到八一年的約四三兆圓。是一二二倍。但這種高成長，其實是在極不公平的代價和相當危險的構造失衡的情形下造就出來的。這一點大多數南韓人民都瞭然。本篇是日本的一位作家對南韓勞動者運動和民主化運動的數天採訪記。裏面所提，很多都讓台灣住民身同感受的。讓我們看看別人，想想自己！

一個新興產業都市

從漢城坐上快速的郊外公車，約行一個小時，便可到達

S市。這是一九七七年被指定為新興產業都市的首都衛星城市之一。人口約五十萬，市區內有三處工業區。

本來是半農村地帶，人口密度並不高。但七〇年代後半

，政府開始推動漢城的「再開發計劃」，市區內的低所得階層，貧民街住民等，受政府的強制遷徙，大量流入這個郊外小城後，使其人口急速膨脹。現有登記的企業為數三百，多



/ 小島優著

/ 辛一鳴譯

民主運動的實態

屬電子、纖維、衣料、製鞋等中小企業或轉包工廠，據說幾乎都是和日本的合辦企業。規模最大的是雇用人數約五百人的運動裝衣料製造廠的美津濃工廠。全市經登記的勞工數有

五萬人。

不同於仁川或九老工業區，這裡重工業少，工資和其他勞動條件都很惡劣，因而大部分都是年輕的未熟練工人。幾乎都是長工時、重勞動、低工

資的工作，勞工運動也不積極。但在這樣的地方，也有自七〇年代末期即已開始的勞工團體自行舉辦的勞工教育課程。

「意識化教育」的現場

慈林教育基金會 典藏

臺灣大學圖書館



這種教育，在南韓普通都被稱為「意識化教育」。據說已經普及到全國，原來是由基督教組織所支援。一次教育期限是四個月，每隔一週的禮拜六到禮拜天，安排一夜兩日的課程。據說本來是每週一次，後來因許多勞工反映，這樣的課程安排太過緊湊，便改為隔週一次。

聖誕前寒冷的一個週末晚上，下了班的勞動者三三兩兩集合起來了，幾乎是十幾二十幾歲的年輕勞動者，男女各佔一半。到十點左右，大約聚了二十個人，開始他們的集體活動了。

先分成幾人一組的小團體，有的開始討論，有的唱歌，甚至也有搞遊戲的，熱鬧得很。每一小團體的主持人，都是年輕的自願工作者。有卅歲左

右的婦女運動家，有大學剛畢業的小職員，也有大學生。

有些工人一開始不好意思開口說話，就先讓他們坐成一個圈圈，請各人就自己的工作情形提出報告，漸漸地有了熱度了，發問者才提一些如：「現在你最不滿意的是什麼？」「這兩週來發生過什麼事情？」等問題。

各種各樣的勞工問題

一位縫紉機工廠的女工（二八歲）說：「薪水經常遲發。應該二十五日要發的，常常拖到月底。二十五個人從早上九點做到晚上十點半，要完成一天一千三百件的基準量，很累。工資是固定的，大約自十二萬到十五萬寰，但如果換算八小時勞動制，只有八萬寰」。

一位製鞋工廠工人（男，廿四歲）說：「我們的廠有一百五十個工人，從五個月前開始準備組織工會，但是障礙很多，我們都拚命堅持下來，到了昨天，好不容易掛上了工會的招牌，大家高興得不得了」。

一位衣料工廠的截斷工（男，十七歲）說：「宿舍在工廠裡面，常常被叫來叫去幹些時間外的雜活。晚上也要睡在截斷桌面上，每天工作十小時，超過的兩小時有加班費。不過因為領了那兩小時的加班費，就得無限制地白做些零工。十小時工作只不過三千二百寰」。

一個木工（男，十九歲）激憤地說：「我有急需，想先支領一點工資，被拒絕了。當然他們有權拒絕，但我好傷心，也好氣」。主持人問這位年輕木工，為什麼要先借工資，他感慨地說：「我已經幹了六年了，工寮裡面沒有暖氣，好髒，很難住，所以想要到外面租房子」。

其他還有：利用中午休息時間偷偷地散發傳單，好不容易組成了工會（勞動法規定，最低須有三十名登記工人始可成立工會）因為要求加班費，即日被調職，因此而拒絕加班，立刻受到「共產黨」的誣指……這是一位女工的故事。

勞工的收支情況

一樣的縫紉工，在漢城一天三千五百寰只是B級，而在這裡是A級。在轉包工廠，普通的工資一天僅有二千二百寰。

說到這裡，大家圍住主持人，開始計算他（她）們一個月的生活費。房租（工寮外）三萬五千寰；燃煤八千寰；伙食費三萬二千寰（工寮一千五百寰；理髮五千寰；水電衛生稅金九千八百寰；交通費一千五百寰；入浴四千寰；衣服一萬寰；酒類飲料二千寰，以上總計十二萬四千寰。十萬寰的收入是無法維持的。最後大家的結論是，大家最少要自己注意，領到的工資正當不正當，有沒有被剋扣？加班時一定要自己做記錄。

資方阻擾「意識化教育」

勞工教室裡大家圍著火爐，課程在一團和氣中繼續到深夜三點鐘。然後喝茶、吃點宵夜，男女分宿有炕的房間。翌日早上九點起，有一些研究中心來的人，文化團體特別為他們而派來的人員也參加進來，便進行各種文化課程的指導，包括唱歌、遊戲、還有性教育等。一直到下午六時才解散下課。

資方當然不歡迎勞動者的「意識化教育」或任何其他其他的勞動者教育。他們想盡辦法加以阻止，妨礙他們的工人來參加。七〇年代對勞工運動的推展曾經做出很大貢獻的UIM（都市產業宣教會）屢遭官方干涉，被看成「共黨爪牙」。美津濃工廠的情況是：勞動時間早上八點到晚間十點，參加政府指定的夜間部教學的工人，可以免除夜班。一週有一次週會，訓話都很長，且每次都頒下注意事項：不能接近天主教青年勞動者（SOC）的集會，也不能接觸其他基督教關係的節目。發生什麼不尋常的情況，或那裡組成了工會，立刻召集經營者會議。

在戰時的氣氛中成長

當筆者在一間天花板很低的，很小的房間坐在一群勞動者中間聽他們講話的時候，突

然開警笛長鳴。今天是一個月一次的「民防日」，從上午十一時起三十分鐘，路上所有的車子都要停下來，屋外的人要立刻躲進地道、大廈裡或屋簷下。帶有威嚇性的男性的喊聲，在擴音機裡面響著，頭上有低飛的飛機聲音。朋友說：一年總有幾次的夜間演習。當局是用這種方法叫國民不要忘記現在是戰時。

即使在這樣的緊張氣氛中，勞動者也積極地來參加各種教育節目。他們的臉上看不出恐懼或猶豫，有的只是學習的快樂，擁有彼此尊重的學習伙伴的喜悅感。其中一個說：「我如果沒有發現這個集會，這時候恐怕在街上毫無目的地踴躍著，甚至酗酒」。

「四個月的學期過了之後怎麼辦？你們不能公開招募會員吧！」我這樣問一位主持人。他回答我說：「請各位結業的人帶新朋友來呀！把他們希望分嚐這份快樂的朋友帶到這裡來！」

「漢江奇跡」的虛實

所謂的「漢江奇跡」，這個廣被宣傳的名詞，意味著南韓經濟的快速成長，由落後國家到中進工業國(NIC)。但這種成長、躍進，究竟是誰的成長、誰的躍進呢？南韓勞動者們經常有這樣的苦澀的懷疑。

「其實，低所得勞工的生活，和七九一八〇年那段不景氣時代沒有兩樣」，這是一位

專家的斷語。

從一九六二年開始的朴正熙政權下的第一次五年計劃，再經一九六六一七一年的第二次五年計劃，前後十年之間，南韓的經濟成長政策，促成了所謂的輸出指向型的工業化政策，以勞力密集型產業（纖維、電子、假髮、玩具、運動器具等）的成品輸出為起點推進工業化。

在這段期間，以馬山為首的加工出口區的設立、韓幣貶值等逐次進行，二十年間，輸出額增加了三倍，GNP也增加了三倍。七〇年代以重化工業為中心，完成了蔚山石油工業中心，再以第三次計劃、第四次計劃的十年時間，實現了造船、汽車、機械製造業的飛躍性成長。尤其造船業，達到了每年四百萬噸的產能，成為僅次於日本的世界第二位。

世界第三大債務國

但是，在以上的輝煌表象背後，南韓經濟的貿易依存度逐漸加深，在成品市場、消費財和資本財的輸入方面，對日依賴性特別高，而國內市場則被犧牲了。為了擴大輸出，原料或機械的輸入不可免，貿易收支經常出現赤字，投資來源求之於日本等海外。八三年底，韓國的外債達到了四〇一億美元，成為僅次於墨西哥、阿根廷的第三位對外債務國。以國民總數來平均，每個人須負擔一千美元外債。新借入的外債也大都用來還債，也就是名

符其實的以債養債。

於是，南韓政府被迫縮小第五次五年計劃（始於一九八二年）的規模。「在這個構造性的不景氣時代裡，大學畢業的白領階級和高職畢業的技術勞工、男性和女性、未熟練勞動者、輸出企業和內銷企業之間的差距愈來愈大。鑑定生產性，也不是根據附加價值的高低，而偏重於管理能力。ROTC（大學在學中志願任軍官者）被安插進企業中，且受到優厚待遇。外資的壓迫，結構性不景氣的所有代價，都被轉嫁在佔全體人口的百分之八十的底層勞動者身上」，一位勞工運動者如此說。

勞工運動的戰鬥課題

回到漢城，訪問了「勞動者福祉協會」的一位指導者。據說是一位從運動的最基層鍛鍊出來的老兵，但看來一臉和氣。

「在朴政權的維新時代，勞動問題是政治和經濟鬥爭的中心課題，工會獲取了某種程度的自由化。但經過八〇年的五·一七政變登台的全斗煥政權，推行所謂的『醇化政策』，所有的民主工會都被扼殺了。八〇年底，在非常戒嚴令下，政府強行勞動法的改惡，使工人們完全失去了對抗企業主的不當剝削和壓迫的手段——包括團體要求改善勞動條件的最起碼的生存權鬥爭。因為在這次的改惡中，勞動三權（團結權、集體交涉權、爭議權）

遭受到大幅度的限制。所以『勞動法改正』運動是我們今天的重大課題。」

長工時低工資高失業率

「結果是即使根據政府勞動部的發表統計資料，八二年的被解雇人數增加了69.7%，達到了九萬八千人。其中因為參加勞工運動而被開除的勞動者，也有三千人以上。失業者超過一百萬人。低工資（一天兩千寰）、十個小時以上的長工時勞動、勞動傷害、不當解雇等，都是今天的勞動者所面對的問題。工會會員數却從七九年的一一〇萬人減少到八三年的七〇萬五千人，減數達三一萬人。」

「再看一些政府發表的統計吧。八三年的經濟成長率是9.3%，勞動生產性的增率是11.2%，勞動時間則由七九年的一週五四.三小時增加為八二年的五六小時。政府說，這是我國勞動者的勤勉美德的表現，顯得揚揚得意」。

觸目驚心的勞動傷害

再看看勞動傷害的情況。傷害件數的激增，可以想像到勞動現場是如何的惡劣。一百個勞工中間有五八個是病人，每一分十五秒，有一個勞動者因勞動傷害而重量傷乃至死亡。根據八一年的統計，在五萬九千個工廠裡面，發生了十一萬六千七百件勞動傷害。每天

有三至四個人死亡，每小時有八十個人以上受傷。還有，肺結核病患者特別多。」

經濟成長的偏跛性

至於在企業的獲利率方面，八〇—八三年間增加了六.五倍；八二年，一七〇五個單位的企業，獲利一八八五億寰；八三年，一九一三個企業賺了十二兆一一五億寰的利潤。其中的三二二個企業的利益增加了37.1%。最大三十家企業的營業額所佔 GNP 的比率，八二年是60%。並且，這個三十家大企業得到了48%的銀行貸款。八二年底的決算顯示，一九九個股票上市企業的純利益在一年之間增加了56%。所謂的南韓經濟的驚人成長，其真相如何的偏跛，可以由這些統計獲得一個概念」

「一小撮獨佔財閥，犧牲了在絕望和飢餓邊緣上掙扎的八百萬勞動者，現在又在動腦筋，想在首都中心地區，利用奧林匹克運動會的舉辦，用『都市再開發』的名義，再次大撈一把」。

「解雇勞動者的數目，比那解雇教授、解職評論員、除藉學生等人的數目多得不知多少倍，並且勞工一旦被解雇，他們完全沒有『復職』『復學』的途徑。勞動者要獲得自己的正當權利，除了徹底戰鬥，別無他法」。那些勞動者運動的指導分子，以低沉却有力的語調，替我簡報了這些南韓勞動群眾的心聲。

社會的最低層

下雪的一天，我被帶到市區的貧民區。插天的高樓大飯店腳下，就是連接著的貧民街。但從飯店的正面，完全看不到。為了不使住宿的外國旅客感受到難看不愉快，貧民屋的屋主，把外層塗抹得乾淨漂亮。但一步踏進小巷子，完全是另一個世界了。娼婦、酒精中毒者、殘廢者等，這些被壓在社會最底層的人們，住在六尺四方的小房間，一天的房租是二千五百寰到四千五百寰。住民中盲人特別多，走進黑暗的建築物裏面，充塞著燃煤產生的二氧化碳，刺鼻的氣味幾乎叫人窒息。據說每年冬季，總有幾百個人會被有毒氣體燻死。

有一位婦女，從兩年前自動住進這些已經失去了生活勇氣的人們中間。她扮演那些人的生活顧問，不管什麼困難，她都會應依賴者的要求，一起研究對策。也有一些學生們，一禮拜三天，志願來教這貧民街的兒童們念書。另外有少數幾個人，開始獻身於最底層人民的組織化工作。

我覺得我窺探到了所謂「南韓民主化運動」的運動本質。我想起了一位青年指導者說過的一句話，「我們所依靠的，是最底層的人們」。他所說的底層的人們，不外是底層勞動者，貧民街的每一個住民。他把八〇年代的南韓民主化鬥爭，以下面的措辭表達出來。

民衆才是鬥爭 力量的來源

「我們在過去有過三次機會，可以把國家建設為一個近代統一國家。

第一次是一八九四年的農民起義，却遭到日本明治政府的干涉而歸於失敗。

第二次是一九四五年日本戰敗，大好機會也因美蘇兩國的介入而消失。

最後一次是六〇年的四月革命，却因受美國支援的軍部的干涉而失敗，使朴正熙登場。

眼前，正是我們的第四次機會。而真正能掌握到這個機會的，只有民衆。我們從八〇年的光州起義，軍事政變的痛苦經驗中學習到這一點。民衆才是我們的後盾，我們深深瞭解到民衆力量的深度和廣度。

勞工運動的三大目標

從那一次以來，我們爲了確立底層人民的運動而全力以赴。我們知道這種工作只能透過戰鬥和情誼，才推展得開。我們的運動，含有三個目標。

第一個目標是：社會的民主化。我們反對支配者的軍事獨裁體制、反對產軍複合體、反對美國及日本的實質支配。

第二個目標是：民族的統一。南韓的政治現況，只不過是新殖民主義籠罩下的一個地區，因此我們反對一切外國勢力的支配。在這個階段，民族主義的提倡很重要。當然，我



們知道它的局限性，到了一定階段，我們必須超越它。不過根本目的是達到不受外來干預的祖國統一。

第三個目標是：貫徹依靠民衆的原則，堅決相信民衆力量。韓國的民主化運動有很多困難和障礙，將來能夠加以克服的，只有民衆的力量」。

並肩向前邁進

「現在，韓國人民的 70% 以上是都市住民。漢城的人口已達千萬，這個城市非常軍事化，軍眷和軍事僱員等和軍隊有關係者有七十萬人，警察十萬人，如再把衛戍部隊也加進去，可以說十個人之間就有一個軍人。不過我們不怕，雖然還在初步階段，我們正在摸索著以實力來和武裝機動部隊周旋的方法」。

八三年九月組成的民主化運動青年連合，在它的機關雜誌《民主化之道》的創刊號上提出了如下一段宣言：

五．一七軍事政變，光州市民大屠殺，光州市民大抗爭，這些事件帶給我們的是痛徹心肺的悲傷，憤怒以及挫折和恐怖，但我們都要予以克服。我們要重新燃燒起我們的怒火，並肩向前邁進！

離開漢城的那個早晨，氣溫降到零下十二度，手脚都凍得發僵，但筆者的心口却暖呼呼的。在短短數天的旅程中所遇見的人們，他們那勇敢却和氣的臉孔，一一浮現在眼前，而連結我們這些海外朋友和正在做艱苦奮鬥的韓國人民的道路，究竟在那裏？我們又如何來鋪築呢？！

前方短打

戰爭中的男與女

——從「聯合艦隊」的廣告詞說起

/ 林 松

戰爭自古有之，從最早的擲石為戰，到今天的核子毀滅的威脅，戰爭的規模越來越大，破壞性也越來越強。至於戰爭的動機、目的與責任問題，向來眾說紛紜，比方最近在市面上映的日片「聯合艦隊」所引起的爭議就是一個例子。

因為歷史角色的關係，戰爭一向被視為「男人的遊戲」，所以「聯合艦隊」上就有這樣一句被用為廣告詞的對白：

「你們男人說走就走，把我們女人當成什麼？」

言下之意，男人自願著去打戰，把女人丟下不管。但是戰爭並不是嘉年華會，說走就走的男人並非去赴什麼喜宴，只是被驅趕著去送死而已，比起女人來，他們才是最直接的受害者。

但是，事情也並不這麼簡單，如果在戰爭中，男人是直接的受害者，而女人是間接的受害者，那麼這種沒有任何人得到好處的大屠殺為什麼會一再地在歷史上重演呢？戰爭真的只是一種集體無意識的行為嗎？

《靜靜的頓河》第四卷的開頭部分，描述1916年10月間，帝俄軍隊在德奧前綫的戰壕中，厭戰、反戰的兵士間所散發的這樣一份傳單：

「兵士同志們！

可詛咒的戰爭延長了兩年之久。你們在戰壕內也痛苦地輾轉了兩年，為著保護和你們完全無關的利益。一切民族的工人們和農民們都流了兩年血。幾十萬人陣亡

和殘廢了，幾十萬人變成了孤兒和寡婦——這就是這次戰爭的結果。你們為什麼打仗呢？你們保護誰的利益呢？沙皇政府驅使幾百萬兵士走上火線，是為了奪取新的土地和壓榨這些土地上的人民，就像壓迫波蘭以及其他民族的人民一樣。世界上的實業家們不夠分配那些能傾銷自己工廠的出品的市場了；也不能分割他們的利潤了——所以，就用武力實行分配——而你們，糊塗的人們，在鬭爭中是為了他們的利益去送死，殺死那些和你們一樣的勞動者們。

同胞們的血已經流夠啦！醒醒吧，勞動的人們！你們的敵人不是奧地利和德意志那些也是和你們一樣被欺騙的兵士，而是你們自己的沙皇，你們的實業家和地主。掉轉你們的槍口去反對他們。跟德意志及奧地利的兵士聯合起來。跳過把你們像野獸一樣隔開的鐵絲網，互相伸出手來。你們——從事勞動的弟兄們，你們手上勞動的血斑痕跡還沒痊癒，沒有什麼可以隔開你們的。打倒專制政治！打倒帝國主義戰爭！全世界勞動者們不能摧毀的團結萬歲！」（見遠景版《諾貝爾文學獎全集》40之2，第580頁）

於此可見，戰爭是某些人為了自身的利益而策動的，而戰爭中的性別差異便不再具有意義，因為被支配階級的男與女都同時成為戰爭的受害者，一如他（她）們在平時的勞動中同樣的被剝削一樣。

安息吧！

/ 魯堅秀

親愛的同學

——敬悼張金增學長



張金增先生，苗栗造橋人。生於民國十九年，歿於民國七十六年，得年五十八。民國四十一年底以苗栗太平案入獄。該案計三十一人，死刑七人，其餘皆判處由十年到無期不等之徒刑。張家弟兄三人皆涉案被捕，金增與大哥金城皆判十年，二哥金平則判死刑。民國五十一年底出獄之後，以做土木小工維生，生活相當清苦，身後留下三男一女，景況悽涼。

安息吧！親愛的同學！

你沒有留下一句話，悄悄的走了。悄悄的拋棄了你賢慧的妻子和年幼的兒女，悄悄的離別了你的兄弟和姊妹，悄悄的離別了你美麗的故鄉和慈愛的父老。

幾個月來，你與病魔搏鬥，你忍受了陣陣痛楚的折磨，挨過了手術刀無情的宰割，可是，却挽回不了你的生命，一去不復返。

你一生，度過了無數個嚴酷的冬天和黑夜，熬過了漫長凜冽的寒風和暴雨。可是，你却一病不起，倒在病魔的手中。

你一生與鋸子、鐵鎚為友，與水泥、磚瓦為伴，替人修房補壁，不怕髒亂，不拘收入的微薄，默默的埋頭工作。

你一生待人和藹，從不多言，以誠待人，從不欺誑。

你一生，省吃儉用，刻苦勤勞，樂觀奮鬥，為妻子兒女，為朋友同學，為自己的理想，貢獻出所有的熱和力，直到油盡火熄。

安息吧！苦難的同學！

你的妻子兒女，會更堅強的成長，你那堅毅的脚印，會永遠留在大地之上，你那善良的心腸，誠實的微笑，也會永留人間。

你那不爭功，不求名利，燃燒自己，照亮別人的高尚品德，會永遠刻記在我們的心中做為典範。

安息吧！冬天過去，就是春天！

安息吧！黑夜過去，就是黎明！

一九八七年二月五日

堅秀 敬悼

柯莉，妳在哪裡？

——曼迪歐納橋

一九八六年二月廿二日，馬可仕——柯拉蓉的一場大選戰終於分出勝負。美國雷根政府也結束了一個月來露骨執拗的拖延戰術，在這一天做下了最後的決定，促使國防部長恩瑞利、參謀總長羅慕斯兩人，順從幾個月以來的激昂民心，放心大胆地宣布和馬可仕斷絕隸屬關係，聲明軍方確認柯拉蓉已贏得了總統大選。

精疲力盡的馬可仕派出的討伐隊，被淹沒在因兩位軍方最高領導人的「起義」而興奮地湧上街頭的人群大海中。

美好的革命

當天，柯拉蓉在同一個群眾大海中宣誓就任菲律賓總統。全球大眾媒介一時都集中在這位「創造了和平革命」奇蹟的婦女身上。所有的讚辭——

包括法國史上的聖女貞德的名字，都冠在她的頭上。其中最令人感慨的是，「和平，非暴力的群眾運動瓦解了驕武好鬥，手握重武器的獨裁者的部隊」這樣的說辭。

古今中外，軍隊是國家的匕首，誰若反抗國家，這支匕首就刺進誰的心臟，除非反抗者手上也握有另一支匕首。現在，一位弱女子，手無寸鐵，却能以笑臉、辯舌、懇求、祈



/ 費新南

泣血民衆的呼喊

禱，再加上手上一束鮮花，竟能帶起了一大群也以笑臉、懇求、呼籲、祈禱、鮮花代匕首的群眾，一舉而瓦解了掌握國政達二十年的馬可仕政府，逼使馬可仕倉惶出走。

對於這次政權的和平轉移，有人讚為「美好的革命」，實在美好的無以復加。尤其對長期生活在充滿暴力和恐懼的政治局勢下的亞、非開發中國家的人民，其美好幾乎讓人不

能置信。即使一向享有比較穩定的政治環境的歐美人士，也都讚不絕口。至於一向支持她最力的天主教教會，更稱之為「主恩浩蕩」下的「愛的革命」的典例。

坦克與鮮花的矛盾

這種以群眾的非暴力運動，來壓制武裝軍警的模式，對一向苦於無法突破執政者的武力鎮制的第三世界某些反對運動者而言，無疑是莫大的鼓勵和啓示！加上柯拉蓉的「溫柔、誠懇、講理、可親」的形像，和追求「民主與和平的真摯勇氣」，這位亞洲的女總統幾乎變成了「理想主義的民主主義者」心目中的典範。

就在台灣，也正不知有多少黨外民主運動者，被她的事蹟所深深吸引。當然，沒有人天真到相信那些坦克兵，是受到了群眾的熱情懇求所感動，那是整個政治局勢在一段時間的不斷醞釀變化影響了士兵們的感覺與看法，使他們握槍的手受到了新的制約。但即使如此，最後那鮮花圍繞坦克的一幕，還是足以使人感動得流淚。

只是，政治是最現實不過的。群眾的願望、夢想，不論編織得如何的美好，一遇到現實中不可迴避的嚴酷考驗時，美夢還是難免會破滅。而人們應該從這破滅的痛苦中去學習一些超越主觀願望的事理。

在新政府成立以來的這一年裡，柯拉蓉在相互傾軋的人事中百般折衝，意欲爭來穩定平衡的內外局面。對一些難纏的政界人物和派系勢力，雖然偶爾也運用軟硬兼施的手段，但總的來說，她是以低姿勢軟工夫見長，她的誠懇講理和痛恨暴力的形像，在與左右兩翼的艱難周旋中還能維持不變，頗能贏得非國人民的稱讚和外國人士的驚歎。

和平形象的破滅

然而，年來大小近二十次，來自各方面——包括新人民軍、左派土改運動者、回教分離主義者、馬可仕舊黨份子、軍中右派份子、最後甚至當年盟友的副總統勞瑞的逼位、國防部長恩利爾的政變陰謀等，規模程度不一的凶險，都能在群眾熱情的「柯莉！」呼聲中一一化解掉了。却於一月廿二



日，終於遇到了自她就任以來最嚴重、最嚴酷，也最具啓發意義的事件了。

正在柯拉蓉為著預定在二月二日新憲法交付公民複決，大聲疾呼非國人民投票贊成新憲以鞏固「愛好和平的人民中間力量」的當兒，竟然在馬尼拉總統府旁發生了舉世震驚的曼迪歐納橋流血慘劇。

人數大約一萬人，要求土改和工作機會的農民運動組織的示威者，受到五百名鎮暴警察和陸戰隊開火掃射，當場死亡十二名，傷者則近百名。

事後，柯拉蓉雖然表示極度的「震驚」和「悲傷」，並立刻下令組織事件調查委員會，追究責任，且把肇事部隊的指揮官和首都衛戍司令暫予停職，靜候調查。

但全國農民組織、人民黨、共產黨等同聲發表了充滿悲憤的指責聲明，認為此一流血慘劇乃柯拉蓉政府反動化的鐵證，人民已視其在實質上無異於馬可仕政權。

接著，共產黨、回教軍皆相繼退出和平談判，誓言在柯拉蓉未能證明有能力約束軍方以前，將不再進入會議室，甚至連一向支持柯拉蓉基力的幾家大報，也都紛紛撰文指責，皆謂這一事件對柯拉蓉個人形象的破壞，將是難以估計的。

誰在統治菲律賓

然而，在民心如此動盪中所舉行的新憲法公民複決投票，竟然能以百分之七十幾的贊

成票而獲得通過，原因何在？是不是就如柯拉蓉在票決勝利後所說的，這是「廣大中間群眾反對少數的左、右兩翼的偏激分子的證據」？當然真相絕非如此，而只能說是至今仍然是菲律賓社會的主要支配力量的地方豪族與大地主的社會控制力尚未顯著衰退的緣故。

按菲律賓經濟與政治的最大主宰力量，是那些大農莊主和戰後由土地資本轉向工業資本的城市資產階級，而總人口中的絕大多數，是豪族地主主宰及控制下的佃雇農。這些佃雇農的處境雖然極為悲慘，但除了小部份由農民解放組織納入其動員範圍外，大多數至今仍脫離不了地主的掌握。這一點，我們可以看看尼古洛島上一位農莊主的自述：

「……這個島上的工人們，都是遵照主人的命令投票給經指定的候選人……這些蔗田農民，對主人的指示，只懂得點頭、服從，千篇一律地接受命令去投票……」。

農民的控制者，除了地主之外，還有天主教教會。

教會的權威，仍然足以左右農民們的投票態度，而教會曾經爲了籠絡農民，防止他們投入解放運動，由教宗針對非國的土地集中發表如下談話：

「上帝的土地不是賜給少數人的。把產自土地的恩惠由少數人據爲己有，是違背上帝意旨的」。

但講歸講，大農莊主、大地主和教會，爲了反對馬可仕的初期改革，還是聯成一氣的。城市的工業家也以半封建式

的支配方法控制著勞工。菲律賓的勞工雖有部分組織，却和農民相似，一離開雇主就無法解決生活問題，勞工組織即使能夠向他們灌輸一些解放理念，但卻無法填飽他們的肚子。

這次的投票，地主、資本家和教會，顯然是真正的勝利者。

坐擁數島的大地主

有關菲律賓的土地集中，外國人另有一種評論。日本人說，這簡直和日本戰國時代的諸侯沒有兩樣。按非國的政治人物，不論是國會議員、地方議會議員以及中央政府、地方政府的官員，莫不出身大、中型地主，尤其中央級政要，都是規模極大的豪門世家。如柯拉蓉的娘家與夫家、副總統勞瑞、前國防部長恩利瑞、參謀總長羅慕斯等，無一不是擁有上千戶佃農，幾萬幾十萬英畝的土地，有時甚至擁有一個島，像副總統勞瑞就有一整個島，轄有六千佃戶。並且這些大地主都擁有可觀的自衛武力。

柯拉蓉如今常被形容爲「本爲平凡的家庭主婦」，這實在是一種誇張不實的報導。據認識她的當年學友們回憶，她家也是數代豪富，她青年時代留學美國時，讀的是名門貴族學校，寓所則被列爲和阿拉伯君王的公主、印度土侯的女兒同級，設備豪華、僕從衆多。在和馬可仕的選戰中，某次她指責馬可仕的土改欺騙了老百姓，並要求對方進行真正的土

地改革，馬可仕私下嘲笑著說：女士，先從妳家做起吧！

至於馬可仕，雖然目前已經是被鬥垮鬥臭的人物，但論其出身，却是比目前柯拉蓉政府中的任何要角都要「清寒一點」。他並非豪族出身，以律師從政而終於當上總統。他腐敗後被當初支持他的人們稱為「背判了平民的平民宰相」是有道理的。

在外國記者間流傳這樣一則故事：

年輕的馬可仕剛當選參議員時，某次參加了勞瑞（當時好像是國會議長）的宴會，因為沒有門閥背景而頗受輕慢，使他在整個宴會的過程中坐立不安，散席後，回首勞瑞巨大豪華的宅邸，以嫉愧交加的心情發下重誓，有一天要堂堂皇皇地進出這個上層社會，否則，就一定要毀滅它。

我們不知道這是外國記者的杜撰還是真有其事。

合法剝削與非法貪贓鬥爭

不過，當初馬可仕頒佈戒嚴令，除了針對非共外，另一個目的是藉機解除地方豪強所擁有的私人武力。他的土改的出發點，開始時也有抑制地主的貪婪剝削，帶給農民一點生機的用意，可惜在掌政用權的過程中，却為了一己的私利，而把當年的一點改革意識都拋棄掉了。

但即使如此，平心而論，馬可仕的財產縱如柯拉蓉政府

所公佈的，有百億美元之鉅，但柯拉蓉及大多數目前反馬可仕的政要們所擁的鉅富，恐怕也不下於此。兩者間的差異，不過馬可仕的錢財是一代投機政客「非法貪贓」的搜刮所得，而後者的財富則是數代「合法剝削」的累積。兩者縱令在法律上的性質有別，但其反人民、反社會的劣質性，則並無二致。

至於菲律賓的大地主、工業資本案，甚至天主教教會，之所以聯合一致反對馬可仕，不過是因為「合法剝削」的體制竟而遭到「違法貪贓」的強人總統的特權干擾，如此而已。

至於那一部分以城市小資產階級，就業或失業的工人階層為主的大馬尼拉區庶民群眾，則因為把生活上的困苦和軍警的橫暴，一律推到馬可仕頭上，再經柯拉蓉身旁的策士合縱連橫一番，罹難的艾奎諾變成了殉教的民主聖徒，未亡人柯拉蓉也就高高地被舉在群眾熱潮的浪頭上面。

對美國的重新效忠

如今，新憲法複決投票獲勝後，柯拉蓉政府顯得意氣昂揚。本月十六日新國防部長伊勒托、參謀總長羅慕斯，分別訪問美國在菲的海空基地，伊勒托竟然當場宣稱：

「美菲基地負有廣泛區域的責任，兩國應建立更強固的軍事關係」。這樣的話，即使當年的馬可仕也不敢說。

菲律賓人民對美國基地的存廢問題非常敏感，他們反對把菲律賓納入美國戰略圈的態度相當堅決，因此，柯拉蓉本身對這個問題也只能表示等契約年限到期後，再由人民來決定。現在，國防部長以軍事行政首長身分竟然越權說出這種話，不能不令人心生疑慮。所謂「廣泛區域的責任」是否即為當年的「東南亞反共公約」再版？

這位「西點軍魂」陶冶出來的菲國將領還說，他已停止調查二月十日政府軍屠殺十七名平民的事件，「因為調查會影響軍隊士氣」。此外，曼迪歐納橋流血慘劇的調查，至今已無聲無息。

此外，也有消息指出，那位因其反共偏執狂的怪誕言行，而被調職到美國前駐韓司令官辛格勞布，已經在招募越戰退伍軍人，組成一支「藍波」兵團，積極介入菲律賓的剿共戰爭，並協助教導菲國軍人如何私用「非傳統戰術」來完成「剿共」任務。

柯莉！妳在那裡？

伊勒托國防部長的談話，是否即為柯拉蓉政府重新對美提出的效忠誓詞？這些言行如無柯拉蓉的默許甚至授意，有沒有可能出現呢？那麼，菲律賓人民心目中「微笑的、和藹的、講理的、反暴力的、為廣大人民奮鬥不懈的」曾經是群眾以淚眼呼喚過的「柯莉！」妳在那裡？

日據時代的

台中第一中學住校生騷擾事件

一九二七年五月四日，台中第一中學住校的五年級學生，因平日學校所雇用的日人炊事員每有對台灣人學生辱罵的舉動，乃由室長代表全體同學向舍監提出罷免該炊事員的要求。校方却認為事出台灣人學生之「民族偏見」，拒絕學生們的要求，且以嚴厲的言辭警告學生對校方人事不得干預。

學生們因投訴無效，反被申斥，全體憤慨不已，認為懷有「民族偏見」者是校方而非台灣籍學生。乃於八日夜，未達熄燈時間先自行熄去校內燈火，且有人以爆竹擲入於舍監室，以示抗議。校方乃對全體住校生施行隔離盤問，欲追究投爆竹者，然終無人供出。校方於此決定對平日被認為和文化協會活動有關的五年級學生五十多名勒令退出學生寮舍。

校方為說明原委，乃召集家長會議。「文化協會」幹部張信義、「農民組合」幹部趙港、及「廣東革命青年團」團員張深切等皆以學生父兄身分出席，會中對校方要求明示對學生之處分方式，旋與校方人員發生激烈爭辯。而所有住校生也群集家長會會場外，大聲抗議校方因偏袒一位日人雇員而決定將多數台灣人學生驅出寮舍。一時氣氛緊張，校方遂不敢當場宣布名單。延至數日後，始對全體五年級學生發出退寮命令。

「文協」會員張信義等認為校方處理不當，面詰校長，並向台中州教育課長提出抗議書。張深切則與住寮學生會面，囑彼團結一致抵制校方命令。到五月十三日，終於集結全校二年級以上學生離校回家，事件演變至此，乃進入集體罷課的高潮。五月十六日在台中市設立「一中父兄大會事務所」「一中出身者大會事務所」兩處，同日下午三時，在台中市公會堂召開校友大會，推張聯三、巍坎、李茂炎等八名為執行委員，把控訴學校當局處理失當，要求令全體離校學生完全復校的決議文面呈內務部長，爰者拒絕受理。繼而「父兄會」移至佛教會內舉行，以張信義為議長，再度達成如前決議。另一方面，「文協」向東京「台灣青年會」提出緊急呼籲，後者乃舉行臨時會議研究對策，並發出檄文激勵學生，事態愈形紛糾。

至五月二十五日，校方採取分化政策，乃與「父兄會」中非文化協會會員者個別談和，最後決定將五年級學生中的積極分子十名處以退學，其餘學生則通過父兄勸告令其逐次復校。然而學生中的氣氛仍然甚為緊張，對校方處理方式深為不滿，尤以看過文協及東京台灣青年會檄文的學生們仍然繼續發出不滿言辭，校方乃於六月九日再度勒令被目為煽動分子的學生四名退寮。至午後七時五十分，學生們熄去校內所有燈火，破壞舍監室門扉，八時三十分，以裝水的橡皮球、墨水瓶、石頭、木片等紛紛投擊玻璃窗，反覆喧譁至十時。

六月十日，情況如前日。十一日，五年級

台灣學潮 (下)

/ 林 涯

和二年級學生全體罷課。十二日熄燈後全體放聲高歌，破壞舍監室玻璃窗三十餘塊。翌十三日，校方勒令二十一名學生退學，十四日再度驅五名出校。其餘學生，終為校方的嚴厲處置所懾，一場學潮終見結束。下面是當時東京台灣留學生團體之一的「東京台灣文運革新會」所發出的檄文。我們可以從中看出殖民地教育爭議的一些焦點。

關於台中一中總罷課事件， 告全校學生大眾書

各位！日本帝國主義已經和世界資本主義的強烈侵略政策合流，且已達成其國家資本主義托辣斯的最高型態，它在殖民地台灣的教育，究竟要帶給我們同胞什麼呢？是要帶領我們去探求真理嗎？非也！自從台灣被迫隸屬於日本帝國主義以來，以充實人格為主旨的教育早已失去了踪影，現時的教育只不過為了養成甘於隸屬甘於屈從的奴隸劣根性，這不就是台灣教育的全盤目的嗎？我們所要求的是長肉增血的滋養物，而他們給我們的，却是石頭和糞屎！

全體被壓迫的台灣學生大眾諸君！此次台中一中的同盟罷課，正是身為支配階級代理人的學校當局，對台灣學生大眾所肆行的絕對專制，遭受到台灣學生大眾的憤怒反擊！身為支配階級最佳看門狗的一中校長，破壞先前所做

諾言，翻臉不承認學生有要求解雇炊事長的權利，由支配者的民族優越感出發，庇護一日人炊事長利益，竟然命令全體台灣人學生退出學寮。更運用警察，對停學中的學生施加威嚇利誘，極盡壓迫愚弄能事。

全體被壓迫的台灣學生諸君！擊在一中同學們身上的鐵槌，意味著什麼？那一無情鐵槌，明天也將擊在我們大家的身上！站起來！站起來！大家來支持全體被壓迫台灣學生大眾解放戰的里程碑的一中全體學生的徹底鬥爭！請大家奮起！打破封建絕對專制政治的爪牙的奴隸教育制度！吾人揭揚左列口號，以之向支配階級最佳看門狗進行徹底鬥爭！

- 學校當局應採納一中全體學生的正當要求！
 - 讓被退學學生無條件復校！
 - 廢止奴隸性教育制度！
 - 爭取校內自由權！
 - 抵制內地延長主義的教育制度！
- 讓我們聚在全體一中解放鬥爭隊的旗幟底下，死守全一中生的同盟罷課！

七·台中師範學校騷擾事件

台中師範學校校規中，有一條規定：學生不得使用台灣話。

一九二八年十一月九日午後九時許，演習



1921年台灣文化協會正式成立

科學生黃成和其它兩名學生，在宿舍內用台語交談，被巡視中的舍監小山重郎發現，當場受到嚴厲且侮辱性的責罵，並吃了幾記耳光。翌十日晨間巡視中，小山又發現普通科一年級學生陳調元、楊賜欽兩名以台語交談，乃當場施以毆打後，利用朝會時間登壇叫罵台灣人學生，大發狂言，說台灣話是「清國奴話」，說誰喜歡講台灣話就滾回到「支那」去，甚至遷怒日本人學生，責其「沒有勇氣檢舉」，說「聽到有人講台語就揍他」云云。

朝會解散後，有十餘名台灣人學生意圖詰問小山，尾隨其後，情況緊張，被另一舍監段證所悉，急加阻止並好言撫慰憤怒的台灣人學生。然學生間的激憤有繼續增高的跡象，校方唯恐事態擴大，乃令小山舍監向學生們承認失言，而部分怕事學生，抱著息事寧人的心理，也有以鼓掌表示諒解者。後因學生中的積極分子多表示如此嚴重的侮辱台灣人事件，只承認失言不足以表示負責，校方遂於十一月二十日

將小山舍監調往台北第一師範學校任教諭。此種調職却是一種明顯的「榮陞」而非「貶降」，致令學生們大譁，咸認「身為教職者辱罵台灣人為清國奴而竟能昇官，太欺負我們台灣人了！」。

「文化協會」因此而與中師學生們屢次交換意見並有所建議，遂有台中師範學校五年級學生盧題，台中商業學校學生二名，及彰化郡阿美公學校分教場訓導鄭安等四名，在十一月十一日，在彰化女子公學校訓導柯紹埔默許下利用該校設備的鋼板油印機，印成題為「中師狗官小山的暴言」三百份，廣泛散布民間。又由文化協會、農民組合、台中店員會等五個團體共組「台灣解散運動團體台中協議會」，印刷及頒佈數種檄文。下面是其中之一，足以令人想像當年教育上的殖民地主義方針和作風是如何的惡劣。

關於中師暴行事件，呼籲全台灣
被壓迫學生諸君

「全台灣被壓迫學生諸君！我們長年來在「嚴禁使用台灣話」「民族差別待遇」「限制讀書」「剝奪接見及外出的自由」「剝奪言論集會結社之自由」等等強制規定下，失去了人類應具的自由權。北師事件、台中一中事件、南師事件……這些都是學生大眾反抗當局彈壓的激憤的爆發！

全台灣被壓迫學生諸君！現在又發生了一件對台灣人學生的暴行事件了。十一月九日夜，台中師範的流氓教員小山某，喝足了大典喜酒後闖入學生的自習室，以「內務不整」為理由打了幾個學生的耳光，又以使用台灣話為藉口，挨了另外幾位學生。大家都懼於其淫威，忍聲吞氣不曾反抗。不料翌日朝會時間，那個流氓教員小山，集合了所有台日人學生全體，大叫大吼說：「台灣是大日本帝國的領土，誰要講『清國奴話』（指台灣），就滾回那個沒有法律的『支那』去！我是奉小原大佐命令來的，我是帝國主義者！誰不服氣，站出來！我用這雙鐵拳揍他個半死！你們這些內地人學生（指日本人學生）也不爭氣。在自己的面前有人講台語，還視若無睹！以後你們看到有人講『清國奴話』，就揍他一頓，我負全責！大日本帝國政府出了八十萬圓創立了這個學校，可不是培養清國奴的地方！」

全台灣被壓迫學生諸君！所謂的「一視同仁」「內台融和」「共學制」等等，我們能相信這些美麗的謊言嗎？那些日本人教員，口說「沒有差別待遇」，却經常對我們肆行差別待遇，現在竟然更進一步拋棄了文化的外皮，公然表明其日本帝國主義走狗的身份，不僅自己肆行暴力，更慫恿日本人學生向台灣人學生施行暴力。現在有三百餘名台灣人學生，忍無可忍包圍了舍監宿舍，要求小山出面謝罪，要求將其罷免，準備斷然發動同盟罷課，以貫徹主張。

全台灣被壓迫學生諸君！問題其實不限於台中師範的一個流氓教員小山，而是日本帝國主義的政策表現，是所有在台日人教員的共

同本質！請看台北師範、台南師範、台中一中的幾次事件吧！日本金融資產階級為了確立、維持、鞏固本身的支配地位，他們不但要彈壓本國的勞動者和農民，對殖民地的工農大眾，也需要做底下手彈壓，對於學生大眾，更需要施行軍國主義的奴隸教育！

對於日本當局的如此的暴壓，日本內地和朝鮮的學生大眾，已經不止一次地站起來，發動過勇敢的同盟罷課了！

全台灣被壓迫學生諸君！我們在台灣，也發動過幾次的罷課，但每次我們都慘敗了。為什麼？那是因為我們的力量不足。只有一個年級、兩個年級的結合鬥爭，是不夠的。我們必須學校一致鬥爭，否則得不到勝利，不！只有一個學校，還是不夠的，除非全台灣學生一致團結共同鬥爭，否則還是達不到勝利的目的！

我們的勇敢的中師弟兄們已經站起來了，同盟罷課已然揭開序幕了！這正是我們報仇的時候了！請各學校立刻召開學生大會，各校提出各自的要求，擲向學校當局吧！這也是我們響應中師弟兄們的義務！

——打倒流氓教員小山！

——絕對反對奴隸教育！

——絕對反對民族差別待遇！

——使用台語應絕對自由！

——打倒日本帝國主義！

又，前面所提的「台灣解放運動團體台中協議會」，是代表文協、農組、和店員會等五個團體的臨時聯合爭議機關。它的檄文內容，不僅突出了殖民地被壓迫民族的積憤，也表露出被剝削階級群眾的反抗情緒。據云當日總督府至為重視此一檄文，秘命台中州特高組深入調查執筆者，並囑留意其散布管道和民間反響。那是因為這一年（一九二八年）初在日本發生了三·一五共產黨大檢舉事件，餘波仍然激盪不已，而日共的所謂一九二七年綱領中，不僅強調人民統一戰綫，更有一條主張完全放棄殖民地，因而總督府對台僑的文協、農組等組織的爭議策略非常敏感。其檄文內容如下：（原件為日文）

為台中事件，告全島工人、農人、小商人及所有被壓迫民衆

我們不幸生息在淪為帝國主義鐵蹄下的台灣三十餘年，受盡了摧殘、屠殺、掠奪、榨取的恐怖至於體無完膚的地步，可說上天無路入地無門。狼肺虎心的支配階級，在政策上如何地壓迫我們，經濟上如何地剝削我們，凡有眼者無人不見。尤其利用奴隸教育扼殺我們社會的未來改革的毒辣手段最為苛刻，彼等搬弄名詞，誣稱過激分子、危險思想等，意圖磨滅青年人的反抗心理，欺騙青年使其垂手掩耳，永遠屈服於支配階級腳下，變成其忠實奴隸馴服走狗。

他們處心積慮，等待機會。驚心動魄的台中師範事件，於此爆發了。只聽其言辭中之一二句便已足夠察其居心，曰「清國奴」、曰「罪大惡極」、更曰「滾出台灣！」。辱罵！毆打！腳踢！連一旁觀看的學友們也遭一場辱打！此一喪心病狂的流氓，更在朝會中進行挑撥，公然自稱帝國主義者！謂帝國主義者不能寬容清國奴，且唆使日本人學生遇見使用台語者揮拳勿救！如此禽獸不如的野蠻狂言，終於激起學友們的義憤，起而責問。這流氓更厲聲答曰「你們不服氣嗎？我更不服氣，非殺你們幾十萬不可！」現在已手持凶刃，準備屠殺！

噫！大難已臨頭！大家勿再旁觀，大家一致奮起，撲滅此一惡徒以救學生！

我們深知，此非一單純的教育界問題，亦非一偶發事件。乃帝國主義下、總督專制下，在壓迫民族與被壓迫民族之間所必然導致的問題。過去的經驗告訴我們，對被壓迫的學生運動，支配階級絕不採公平的處斷態度，而只以陷害的殘酷手段對待。因此我們全體被壓迫民衆，需要一致奮起，擁護學生利益，保障學生勝利，堅持終極目標。

台中師範的學友們為正義而奮不顧身，轟轟烈烈地起而宣戰了。誰沒有兄弟，誰沒有子女，我們不僅為本身利益計，亦為子孫將來計，為學生前途計，唯有急起、直追，喚起衆論

，結合一切力量，剷除此一惡勢力！讓我們高呼下列口號：

打倒暴行教員小山！
反對奴隸教育！
要求學生自由權！
打倒總督專制政治！
被壓迫民衆解放萬歲！

一九二八·十一·一五

台中師範事件中，除了頭一天有幾十個學生似有欲對小山採取直接行動的跡象，但在校方強令小山承認失言的應付措施下暫時大家都隱忍下來，此外學生們對校外組織的抗議活動都表現得很謹慎，因此，在整個事件過程中沒有學生公開受到退學處分。學生們的自我約束，可能還受到去歲台中一中事件中有近四十名學生被勒令退學的悲劇性結局的心理影響。如前述，當年的師範生大都家庭清寒，生計壓力很大，顧慮自然不得不比一般中學生要多一點。另外，就校方來說，小山的言行也的確過份狂妄，即使以殖民地教育的特殊範式來論，亦屬無益有害的挑撥，且似乎具有右翼背景，校方也不便無條件支持，恐事態複雜化不易收拾。

結論

綜觀以上五次學潮，雖然具體的起因和經過結果，都各有不同，然殖民地被壓迫民族意識在第一次大戰後的潮流中的激盪，是其共同的主要性格，這一點無可置疑。也就是說，總督政治支配下的台灣學潮，無非也是反殖民主義民族鬥爭運動中極為突出的一條戰綫，其影響和作用範圍，是相當廣泛的。

昭和六年（一九三一年）以降，日本統治階級急速法西斯化，台灣一地的反抗運動雖然逐漸帶上了階級運動的色彩，却在軍部勢力的膨脹中，凡學運工運農運等，各個鬥爭領域皆在以武職總督為象徵的變相軍政控制下一時慘被窒息了。

短歌兩首 金山

我的媽媽 現實

看到了玉蘭花
想起了親愛的媽媽
別人的媽媽白又胖
我的媽媽瘦又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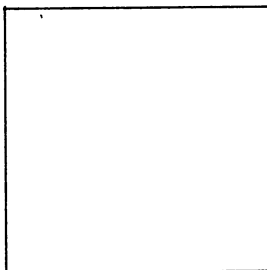
看到了淡水河
想起了親愛的媽媽
別人的媽媽溫柔又嫵媚
我的媽媽醜又黑

來到了南台灣
我想抱一抱親愛的媽媽
年老的媽媽蹲在稻田邊
膝下少了子孫們承歡

來到了北台灣
我想抱一抱親愛的媽媽
忙碌的媽媽只要錢
不要我也不不要從前

並不是不知道
校園裡大山柔水的生涯
所有故事裡的悲歡怨愛
都祇是上班途中的塵埃
漸漸在失眠的夜裡沉埋

也不是不知道
醒過的夢再也回不去
明天的打卡還得繼續
啊，這樣的生活痛苦已極
這樣的社會要不要放棄？



編後語

「二二八事件」是台灣人民心目中的一個歷史牢結，本期以三篇文章加以紀念：

唐山先生的《大鼓與黑牢》，記述他當年的一段二二八經歷，西本願寺的黑牢雖然是他畢生的夢魘，但公賣局前大鼓車上的演講人，以及報館中的本省同事，却將是他永遠懷念的對象。

《美夢與悲劇》則以二二八為背景，勾勒了台灣現代史上的一個悲劇人物——王育德先生的側顏，一個深愛故土，却用了一種不被歷史認同的方式去愛的熱心人，他的傷心與無奈。

到底應如何看待二二八？何平先生以為無關乎省籍或地域差別，而只是在帝國主義侵凌剝削之下，加深了中國的貧窮，從而也激化了階級矛盾，二二八就是這個階級矛盾的結果。《二二八的省思》一文，對此細緻地做了分析。

立法院長是否應有任期？成為最近熱門的政治話題，張大林先生認為這只是個枝節問

題，關鍵的問題在於權限，而不在於任期，他以豐富的憲法學知識解析所謂「戡亂體制」，言人之所未言，對眾說紛紜的任期爭議，提出獨特見解。

本期以八個彩色頁規劃了兩篇現場報導——《最後的農民》和《向魚蟲進軍》。

因為依附於菸酒的壟斷專賣體制，台灣的菸農與葡萄農的收益，一向冠於其他作物的農民，但這個優勢在菸酒開放進口之後終於消失了。

東港漁會以漁民的名義冒貸鉅款，逼使漁民家破人亡，雙方爭執已非一日，最近受害漁民在社會運動家姚國建與陳秀賢的協助下，再度掀起了抗議的高潮。

《失業率與你》一文，方達先生指出，「失業率」通常只做為資本家投資的參考指標，對一般人並沒什麼具體的意義，如果你不幸目前正在失業中，它並不能成為你的就業指南。

台灣的勞工運動，目前正在起步的階段，對照於同為開發中國家的南韓，可謂後進得很，南韓的勞工運動的觀念與作法，有值得我們效法與學習之處。

《戰爭中的男與女》雖然只是一篇短文，但却犀利地剖析了戰爭的本質，澄清了階級矛盾下的男女關係——戰爭的受害者是一個階級的男與女，而不是沒有階級分別的男人或女人。

被稱為「美好的革命」的菲律賓不流血政變，由柯拉蓉取代了馬可仕之後，是否因為柯拉蓉的笑臉就可以把菲律賓帶上和平、富足之路呢？貧窮問題、土地問題、宗教問題以及對美國開放的問題等等，盤根錯節，想來並不是那麼容易解決的，而以柯拉蓉政府人士的出身背景和階級立場，是否能解決前兩個問題實在大成問題。

《日據時代的台灣學潮》本期續完，讀完這篇摘錄自日帝治台的官方文書之後，得到這樣的一個印象，即使是在異族的統治之下，台灣青年的抗爭精神還是頗為高亢，這一點，或為今天的青年學生所不及吧！

訂正啟事：本刊上期第 50 頁圖片，誤以鄭南榕先生為姚國建，除去電向鄭先生取得諒解之外，特此向讀者更正致歉。